

# 领导科学论坛

# 大讲堂

THE FORUM OF LEADERSHIP SCIENCE

2020年第10期 总第178期

P<sub>03</sub> 生态文明建设“十四五”规划与二〇三五远景目标

P<sub>32</sub> 充分发挥党支部的主体作用，担负起教育、  
管理、监督党员的职责

P<sub>53</sub> 智慧城市和信息化推进若干研究

P<sub>76</sub> 中央红军长征战略方向选择演变及启示



# 新时代创造新模式 新模式学习新思想

## 学习中国智慧党建云平台

学习中国智慧党建云平台是运用大数据、云计算、新媒体、智能知识组织和新一代天地一体信息技术独家创新研发的多网跨终端共享的全场景智慧化党建多功能新型智能平台。平台为党建工作提供了全方位的综合解决方案，实现了党务和业务的智能化融合，为党的全面领导、党建的全面引领提供了信息化路径和智能化手段，让党务和业务实现无缝对接。

### 平台系统结构

- 1 党员干部学习全媒体资源库
- 2 智能化知识组织系统
- 3 多级党务业务一体化云平台
- 4 党员干部多级学习平台



- 5 智能移动终端融合应用系统
- 6 智能化党建运营管理中心
- 7 大数据分析、监控、演示系统
- 8 北斗双向卫星站

### 创建平台的目的是

- 解决党务业务“两张皮”问题
- 解决个人学习与集体学习“两张皮”问题
- 解决内容和技术“两张皮”问题
- 解决线上线下“两张皮”问题
- 解决单位内部的多平台和信息孤岛问题
- 解决多级多层重复建设问题
- 解决资源分散缺少系统性和逻辑性问题
- 解决缺少规范性和标准化问题
- 解决平台的安全问题

出品单位：《中国企业报》集团智慧党建研究院

联系方式：010-62805956、68001238

联系人：薛红霞15010167295 王强18518039399 刘红13126508885

◆ 生态文明建设“十四五”规划与二〇三五远景目标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社会和生态文明部 郭兆晖（3）

◆ 充分发挥党支部的主体作用，担负起教育、管理、监督党员的职责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党的建设教研部教授 王 瑜（32）

◆ 智慧城市和信息化推进若干研究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 潘 文（53）

◆ 中央红军长征战略方向选择演变及启示

……………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 王新生（76）

## 编委会

顾 问 张全景 刘道玉 张国祚  
杨叔子  
主 任 陈建才  
编 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元璋 王泽龙 别少波  
别业舫 何兴亮 何国治  
吴开胜 吴华品 周大仁  
周 勇 周祖元 赵耀宏  
顾 杰 秦在东 梁前德  
彭元杰 谢成宇 蔡尚华  
熊泽金

董 事 长 肖昌斌  
总 经 理 周发秋  
社 长 谢成宇  
主 编 陈建才  
副 主 编 张永平  
执 行 主 编 夏晓畅  
外 联 部 主 任 薛红霞  
发 行 部 主 任 董晓丹  
读 者 服 务 部 周蓉国  
责 任 编 辑 王 韬 赵春燕 钟 雪  
马 程 侯 欣 周 凯  
美 术 编 辑 田良娟



历史是人民书写的，一切成就归功于人民。只要我们深深扎根人民、紧紧依靠人民，就可以获得无穷的力量，风雨无阻，奋勇向前。

——习近平

主管单位 长江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主办单位 湖北长江报刊传媒（集团）有限公司

出版单位 湖北长江报刊传媒（集团）有限公司

联办单位 国家与地方治理网

北京新时代中特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原北京宣传教育服务中心）

编辑出版 领导科学论坛杂志社

发行广告部电话 010-68006063 68005003

编辑部电话 010-62807007转8148（北京）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CN 42-1837/C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 ISSN 2095-5103

邮发代号 38-406

广告经营许可证 广登准字（2019）4200000016

编辑部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乙5号  
鸿儒大厦B座二层（西楼梯口）  
武汉市洪山区桂元路67号

编辑部邮箱 xxwdjt@163.com

ldkxlt@sina.com

出版时间 2020年10月15日

印刷 廊坊市凤海印务有限公司

定价 15.00元

# 生态文明建设“十四五”规划与 二〇三五远景目标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社会和生态文明部 郭兆晖

**摘要：**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高度肯定了“十三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所取得的历史性成就，以高瞻远瞩的顶层设计擘画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未来蓝图。同时，对生态文明建设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要求、新目标并作出新部署，为我们做好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各地的生态文明建设应遵循《建议》要求，抵御各种风险挑战，进一步破浪前行，为我国早日实现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而共同奋斗。

**关键词：**生态文明；“十四五”；绿色发展；共同富裕

## 一、二〇三五年基本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远景目标

党的十九大提出“两步走”战略，这一部署完整勾画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时间表、路线图。改革开放之初，我们党提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分“三步走”战略。党的十九大确定从2021年到2050年的30年将分两个15年安排。这样，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时间表、路线图就完整地分为了五个阶段：第一阶段，改革开放之初到1990年主要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阶段，1991年到2000年使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阶段，2001年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第四阶段，2021年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第五阶段，2036年到2050年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

现代化强国。因此，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正是按照“两步走”的战略部署，聚焦于第四阶段——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作出的重要规划。

《建议》和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以下简称《纲要》）十分相似。（“九五”时期还称之为“计划”）。《纲要》提出，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关键是实行两个具有全局意义的根本性转变：一是经济体制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二是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建议》也提出了两个重要论断：一是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二是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两份报告在内容上都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角度为下一阶段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后者更是为我国迈入新阶段，经济社会发展进入全面绿色转型新格局作出了全新的战略部署。这是我国向集约型增长方式转变之后，要迈向的更高台阶，这也是我国生态文明领域建设的基本遵循。

### （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生态文明绝不是简单地污染防治、环境保护，更重要的是文明的转型，其重要标志就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全面绿色转型。《建议》从九个方面勾画了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远景目标。我们要建设的现代化就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习近平总书记对人与自然的有一个非常精辟的论述：“我们要构筑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人类可以利用自然、改造自然，但归根结底是自然的一部分，必须呵护自然，不能凌驾于自然之上。”古语有云，“人定胜天”，指人类是可以通过自身的力量去克服改造自然的，但是此次新冠肺炎疫情的发生，以及一系列的洪涝、火山、地震等自然灾害，无一不告诉大家，人类其实在自然界面前十分渺小。

那么，这种人与自然的的理念来自哪里？其一来自马克思主义关于人

与自然关系的重要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提到，“学习马克思，就要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马克思认为，“人靠自然界生活”，自然不仅给人类提供了生活资料来源，如肥沃的土地、鱼产丰富的江河湖海等，而且给人类提供了生产资料来源。自然物构成人类生存的自然条件，人类在同自然的互动中生产、生活、发展，人类善待自然，自然也会馈赠人类，但“如果说人靠科学和创造性天才征服了自然力，那么自然力也对人进行报复”。自然是生命之母，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类必须敬畏自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其二来源于传统文化理念的精髓。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引用老子的话，“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应该遵循‘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理念，寻求永续发展之路。”“天人合一、道法自然”集中体现了中国古代的生态智慧。

习近平总书记吸收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汲取中国古代“道法自然”的生态智慧，创造性提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思想，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为建设美丽中国指明了前进方向。

我去德国考察时，发现当地生态文明建设卓有成效，尤其是农村的生态文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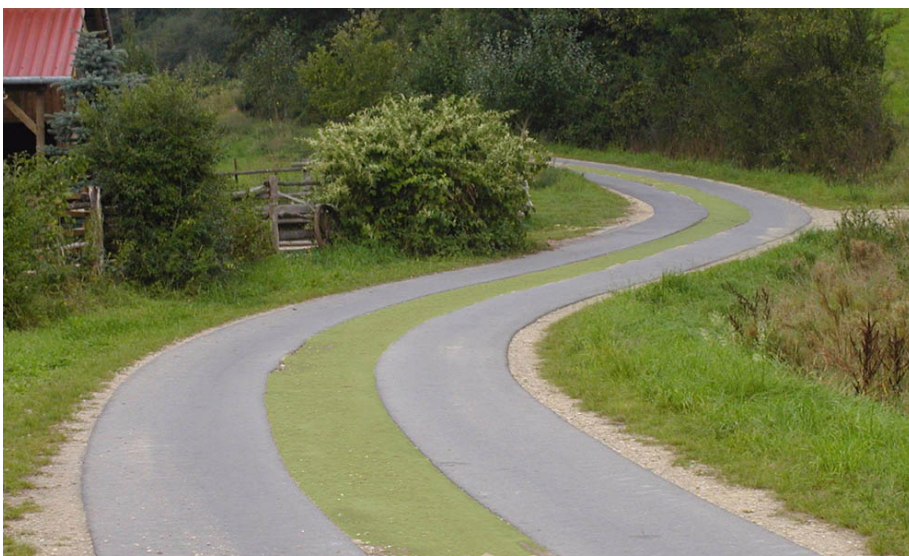


图 1：德国乡村公路

图 1 是德国巴伐利亚州一条普通的乡村道路。初看觉得很奇怪，但仔细思考其设计也会深受启发。这些年，德国把人行道、自行车骑的硬化道路全部重建，恢复成石子路，把汽车通行的路设计成车辙路，中间刨除只留下两道车辙供轮子通过。他们之所以这样做就是要把最大的空间还给大自然，让大自然和人类发展有机结合。



图 2：德国乡村老房改造

图 2 是德国经过改造的老房子，约有 500 多年的历史。翻修改造用的都是生态化的材料，深色部分是木头框架，浅色部分是黏土。虽然外观较为古朴，室内全都是现代化的设施。他们通过这种方式将传统和现代结合起来，真正实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



图 3：德国的下水道



我们再来看一个小细节，图3是德国农村的一个下水道。德国南部降雨量不小，当地人只做了一个很小的改造，就非常好地解决了农村内涝的问题。德国的下水道到底有什么不同？我们打开下水道，可以发现里边安装着一个带漏洞的铁皮桶，底下还有一个红色的塑料桶，只要环卫工人定期清理铁皮桶，下水道就可以非常畅通，通过这种方式以较低的成本解决了农村的内涝问题。



图4：日本大地艺术

图4是日本北川富朗教授做的“越后妻有大地艺术祭”项目。当年日本面临和今日中国同样的形势：在快速工业化的过程中，年轻人都离开农村进城务工，乡村仅留下老弱病残，环境污染严重。北川教授看到家乡的变化后非常痛心，所以组织很多艺术家去设计、去进行艺术创造，借此复兴当地文化。从前发展经济，只看到煤、矿等物质资源的重要性，而完全忽视了文化这种非物质资源。从上图可以看出，该地就风景而言较为普通，但经过艺术的创造，这个地方感觉就令人耳目一新了。于是，这个地方借助文化艺术慢慢步入发展轨道，目前已成为世界著名旅游景点，带动了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



图5：衢州金星村

图5是浙江衢州金星村，该地在生态文明领域做了很多创新，村民在废弃的酒坛子里种花草或树苗，有的还做了一个类似滴灌的小装置，用作浇水，这些别出心裁的设计成为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2006年8月16日，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到金星村考察，嘱托金星村村民：“人人有事做，家家有收入，这就是新农村。”2019年7月12日，文化和旅游部发布了《关于公示第一批拟入选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名录乡村名单的公告》，对第一批拟入选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名录乡村名单进行公示（公示截至2019年7月16日）。其中，浙江省衢州开化县华埠镇金星村入围。



图6：山草房中的国际会议

我之前在山东莱州初家村挂职时，对当地的房屋做了整体改造。图6是村里的一大特色——山草房，屋顶的植物名字叫“山草”，用它覆盖屋顶，屋内冬暖夏凉。勤恳的村里人世代都会从山上收集这种山草，即便是砖瓦到处可见的今天，村里仍然保留了这种传统。我在这里组织了一场高端国际化会议，有众多国外知名专家参会，他们对这种经过改造的生态化村庄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为很多外国专家来中国开会，一般都是住星级宾馆，而全世界的星级宾馆大同小异，但是这种经过生态化改造的乡村，真正展现了中国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特色。



图 7：鸟巢温室

目前农村随处可见塑料大棚，塑料薄膜已经成了农业最重要的污染，而且既不美观也无法抵抗风雪等灾害。图 7 是一个鸟巢形状的温室（Domepod，顶集成温室），是一种基于仿生学的新型曲面球体温室。它利用自然界鸟类筑巢的三角交叉法，结合蜂巢的六角加固方式复合而成，能够经受强风和重压。将其用于农业种植，类似于构造一个工厂化的车间，不受季节和气候的影响，且它的利用空间会更高，一亩相当于室外五亩的耕作面积。这个地方既可以成为旅游景点，又实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不是简单地保护自然，而是人和自然共同的生长、共同的发展。所以，生态文明一定要和高科技发展结合在一起。比如鸭稻共生技术，包括在鸭子什么时候放、什么时候收、放什么品种、放多少密度等技术要领，是经过周密实验和研究得出的一套非常精细化的生态技术。

## （二）二〇三五年基本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远景目标

生态文明是什么？生态文明是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环境等各方面人类所创造成果的总和，是在渔业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基础上形成的一种新的发展模式。习近平总书记说：“生态文明是工业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新要求。”“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这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要求。

《建议》对十九大报告提出的二〇三五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

进行了细化，对生态文明建设的目标提出了明确要求，即“广泛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碳排放达峰后稳中有降，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美丽中国建设目标基本实现”。

### 目标一：广泛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

2017年5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进行第四十一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是发展观的一场深刻革命。”这就要坚持和贯彻新发展理念，正确处理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坚决摒弃以牺牲生态环境换取一时一地经济增长的做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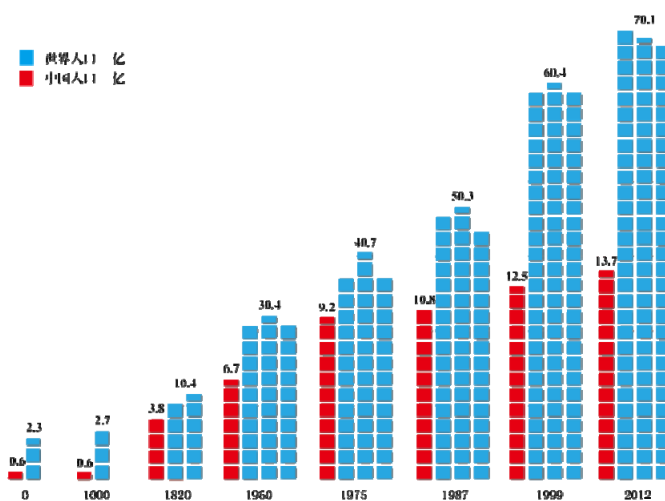


图8：世界人口和中国人口的发展情况

追溯人类历史，从公元元年到现在，我们用人口和GDP来说明人类经济社会2000多年以来的发展变化。图8是世界人口和中国人口的对比情况。图中数字“0”代表公元元年。公元元年，世界人口只有2.3亿人，中国人口为6000万人左右；1000年以后，世界人口仍然是两亿多人，中国人口仍然是6000万人左右，没什么变化。到1820年，此时西方工业革命发展到一定阶段，这一年世界人口突破10亿人，中国通过各种粮食作物的引进，也实现了人口的增长，达到3.8亿人。随后世界人口增长幅度的时间间隔越来越短，1960年世界人口为30亿人，1975年达40亿人，1987年达50亿人，1999年达60亿人，2012年达

到 70 亿人，当年中国人口也达到 13.7 亿人。由此可见，工业革命以来，尤其是近几十年以来，世界人口和中国人口都出现了较为高速的增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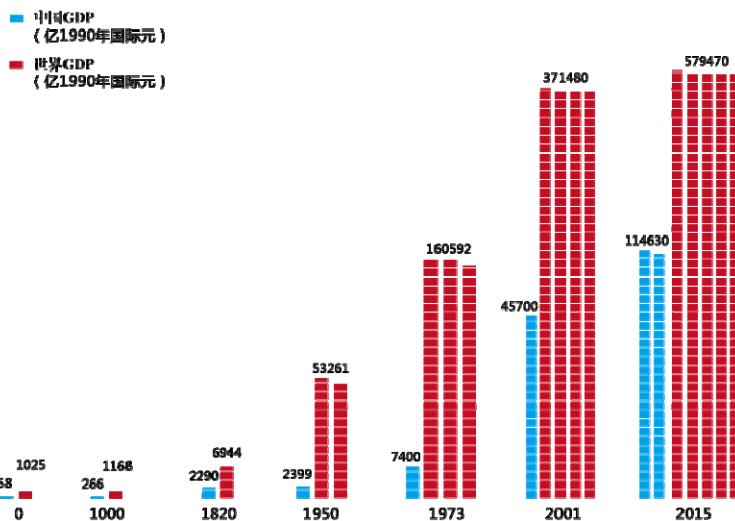


图 9：中国和世界的 GDP 发展情况

再来看看 GDP 的数值。图 9 引用了英国经济学家安格斯·麦迪森的著作《世界经济千年史》的数据，安格斯·麦迪森用经济学的方法把世界各国几千年以来的 GDP 发展情况用数字统计出来。我在这里引用了他的数据，注意他用的单位是 1990 年的国际元（在特定时间与美元有相同购买力的假设通货单位。1990 年或 2000 年常用作基准，与其他年份作比较），这是一个学术单位。公元元年，世界 GDP 是 1000 多亿元，中国 GDP 是 260 多亿元，1000 年之后，可以发现 GDP 和人口变化特别相似，都没有较大变化。到 1820 年，中国 GDP 在世界的占比高达 30% 以上。此后中国 GDP 的发展相较于世界总体发展速度就开始走下坡路了。1950 年时，中国的 GDP 和清朝中期相当，这说明这一百多年来中国的经济都没有较大发展，和世界经济差距越来越大。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才开始追赶，最初追赶的脚步有些慢，但是到 21 世纪初，中国开始迎头赶上。2015 年，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从这张图可以看出，工业革命以来，世界和中国的 GDP 都呈现出较为高速的增长态势，那么这种增长模式还能否维持下去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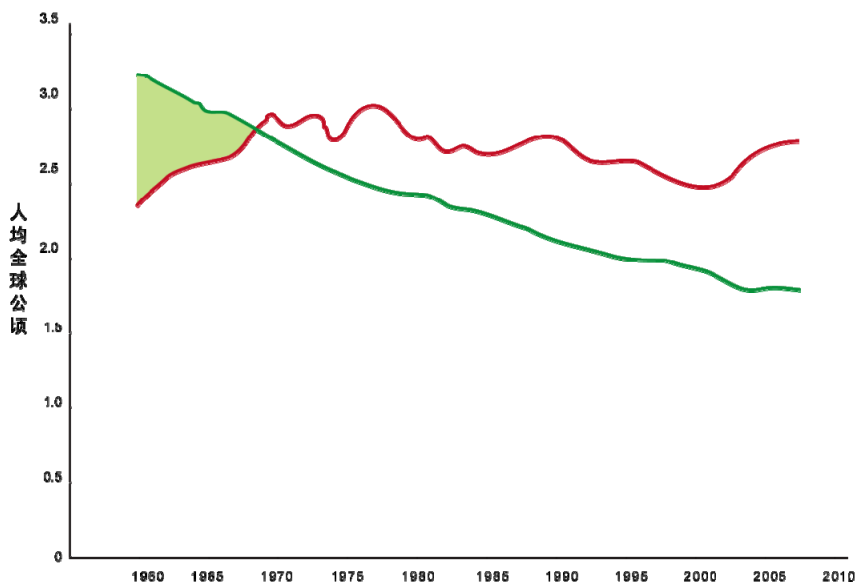


图 10: 世界人口消耗资源的情况

我们再看一组生态足迹研究，如图 10 所示，绿线代表世界上人均占有资源量，红线代表世界人均消耗资源量，我们可以看到绿线在不断下降，而红线在不断上升，1970 年左右两线相交，而 2008 年是标志性的一年，人类消耗了 1.5 个地球的资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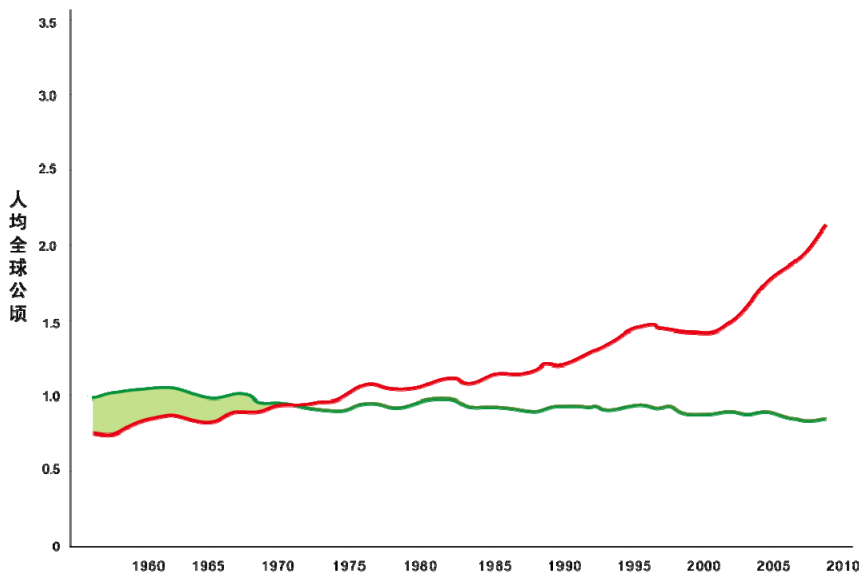


图 11: 中国资源消耗情况

再来看看中国的资源消耗情况，如图 11 所示，红线上涨得很快，绿线基本保持平缓，但平均水平较低，因为我国人均占有资源量小。2008 年，我国一年所消耗的资源大概相当于 2.5 个地球的资源。

所以，通过以上两个研究，大家应建立一种新的思维，把人的系统抽象为经济系统，把大自然的系统抽象为生态系统。习近平总书记说，“人类归根结底是自然的一部分”，那么人类的经济系统也应该是生态系统的一个部分。如果说原来的世界是一个空的世界，现在就是一个满的世界。工业革命以来，尤其近十几年以来，随着经济系统的不断扩张，人口、GDP 的规模不断扩大，整个的生态系统已不堪重负。

那么，习近平总书记说的“一时一地经济增长”是一种什么模式呢？就是不断增加自然资源的投入量，靠消耗更多资源、破坏更多环境换来的经济高速增长。所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根本改善生态环境状况，必须改变过多依赖增加物质资源消耗、过多依赖规模粗放扩张、过多依赖高能耗高排放产业的发展模式。转型就是要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我们可以通过技术手段，实现生态系统提供给经济系统的自然资源总量保持不变，而经济系统排放到生态系统当中废弃物的总量保持不变。

经济增长到底为了什么？我们发展到底为了什么？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我们越来越关心生态环境领域中的自然资本，自然资本质量和效益的提升将会极大增进人民的幸福感。

那么如何衡量幸福的增加，实现科学发展呢？目前，经济增长的测度指标是 GDP，现有经济观念认为经济增长即 GDP 的上升代表着人们幸福的上升。2015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安格斯·迪顿研究发现金钱能不能“买到”幸福有一个关键的“幸福拐点”，这个拐点在美国是年收入 7.5 万美元，大约相当于美国的中产阶级家庭收入水平。超过这个数字，增加收入不再会增加做一些重

要事情的能力，也不会让你感到更幸福。著名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也在给法国时任总统萨科齐的报告中说，“GDP不能很好地衡量幸福，还会使我们对经济危机失去判断力。必须重新定义经济增长，能够反映经济活动的可持续性”。

总体而言，GDP不能衡量自然资本带来的幸福。有以下几点原因：第一，GDP核算以市场交易价值作为核算基础，参与市场交易中的自然资源的开发成本进入GDP核算中，但一些没有参与市场交易中的自然资源则被排除在核算体系之外。第二，GDP核算将环境保护支出作为投资活动，结果是污染物排放越多，环境保护支出就越多，GDP数值也就越大，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反而能增加GDP。第三，经济活动往往造成环境污染，引起环境质量的下降，然而GDP核算不包括对环境质量下降的成本核算。

此次《建议》没有提及GDP增速目标，之前2020年《政府工作报告》也没有提及定量。2020年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阐明了这一重大抉择背后的深意：“如果我们硬性定一个，那着眼点就会变成强刺激、抓增长率了，这样不符合我们经济社会发展的宗旨，我们一直在讲不以GDP增长率论英雄。‘六稳’‘六保’，我们追求的是经济的科学发展、是贯彻新发展理念，追求的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幸福美好生活。其实在追求这些的时候，也会间接推进国内生产总值降幅尽可能减少，但着眼点着力点不能放在GDP增速上。”

那如何具体评价绿色发展呢？我国开发了一整套绿色评价的指标体系。2016年12月2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生态文明建设目标评价考核办法》，要求各个地方推动生态文明的评价考核，构建一整套绿色发展的指标体系，包括资源利用、环境治理、环境质量、生态保护、增长质量、绿色生活、公众满意程度等方面的一系列具体指标，以此来衡量一个区域、一个企业的绿色发展情况。

## 目标二：碳排放达峰后稳中有降

2020年9月22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中国将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



措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将承诺写入这一次的《建议》中。

碳中和是指排放的二氧化碳和吸收的二氧化碳要相等。目前，我国二氧化碳的排放主要来自化石燃料的燃烧，主要是煤炭、天然气、石油等。2015年，我国全年能源消费总量达43.0亿吨标准煤，占世界23%，人均3.1吨，是全球最大的能源消耗国。而碳中和是中国对全世界的一个巨大承诺，中国不仅仅要建美丽中国，更要建清洁美丽的世界。

经济社会的绿色转型需要推进市场化交易，《建议》提出，“推进排污权、用能权、用水权、碳排放权市场化交易”。以碳排放权为例，它能够给企业提供巨大的经济利益刺激，推动企业自发地而不是政府强制地减少排放。

欧盟从2012年开始推行二氧化碳排放交易市场，仅2013年拍卖的收入就达到36亿欧元，当年相当于300亿人民币左右。但我国当时还停留在行政化处罚企业。当时最严格的环保法还在修订当中，没有出台，所以很多企业花钱买排污权，然后就可以随意排污。所以当年收的排污费并不多，整个国家的排污费只有216亿人民币（数据来源于2013年原环保部）。

2011年，按照“十二五”规划纲要关于“逐步建立碳排放交易市场”的要求，我国在北京、天津、上海、重庆、湖北、广东及深圳7个省市启动了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截至2020年8月末，7个试点碳市场配额累计成交量为4.06亿吨，累计成交额约为92.8亿元。

### 目标三：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建议》提到，“人民生活更加美好，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这一要求体现了对“共同富裕”的高度重视。实现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马克思指出：“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所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人全面发展的一个重要指标。

2020年4月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首都义务植树活动时指出，良好生态环境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体现，是人民群众的共有财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最大的差别在于分配。西方主流经济学家认为经济增长可以自动解决分配问题，那是不是这样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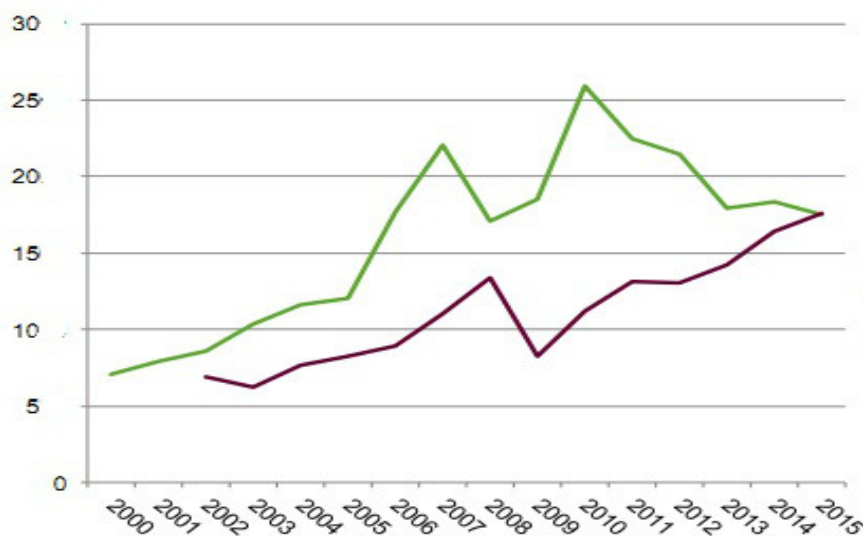


图 12: 贫富研究

图 12 展示了 2019 年的一项研究，世界最富有的 62 个人和世界最贫困半数人口。绿线代表等号全世界最穷的 36 亿人所占有的财富，棕线代表最富有的 62 个人所占有的财富，这两条线在 2015 年交叉，说明全世界最有钱的 62 个人所占有的财富和全世界最贫困半数人口所占有的财富一样多。收入差距不断扩大是全世界普遍存在的问题。

《中国民生发展报告》丛书是基于北京大学中国家庭追踪调查 (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 CFPS) 撰写的系列专题报告，以全国 25 个省市 160 个区县的 14960 个家庭为基线样本，探讨民生问题状况、差异、原因和社会机制。据 CFPS2012 资料的估算结果显示，中国家庭财产基尼系数从 1995 年的 0.45 扩大到 2012 年的 0.73。顶端 1% 的家庭占有全国约三分之一的财产，底端 25% 的家庭拥有的财产总量仅在 1% 左右。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更多的自然资本这种人民共有的财富能否公平合理地分配是我们目前亟须解决的问题。例如，昆山只是江苏省下属苏

州市的一个县级市，一年GDP4000多亿元，相当于青海加西藏的总和。怎么来看待区域之间的差异呢？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非常清楚地回复了这个问题：“青海和西藏的主要区域是重点生态功能区，是世界第三极，生态产品和服务的价值极大。如果盲目开发造成破坏，今后花多少钱也补不回来。”因此，《建议》强调要完善市场化、多元化生态补偿，以此缩小区域差异，逐步实现共同富裕。

## 二、“十四五”时期生态文明建设的主要目标

《建议》用六个“新”来概括“十四五”期间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经济发展取得新成效、改革开放迈出新步伐、社会文明程度得到新提高、生态文明建设实现新进步、民生福祉达到新水平、国家治理效能得到新提升。其中，生态文明领域的具体要求是：“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得到优化，生产生活方式绿色转型成效显著，能源资源配置更加合理、利用效率大幅提高，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持续减少，生态环境持续改善，生态安全屏障更加牢固，城乡人居环境明显改善。”这是一个很高的要求。

## 三、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生态文明建设取得的决定性成就

《建议》指出，“十三五”时期，我国“污染防治力度加大，生态环境明显改善”。这五年，我国在生态文明建设方面取得了诸多成就。

作为当今世界最先进的发达国家，美国在生态环境领域却劣迹斑斑。2020年10月，外交部网站发布《美国损害环境事实清单》和《美国损害全球环境治理报告》两份文件，揭露了美国这些年对生态环境造成的巨大破坏。以温室气体排放为例，《美国损害环境事实清单》指出，美国是全球历史第一排放大国、全球累积温室气体排放最多的国家，其1751年至2010年间能源和工业部门排放占全球的27.9%，累积排放量约是中国的3倍。美国还是当前第二排放大国，

排放全球占比约为 15%。美国民主党女议员科尔特斯等人提倡“绿色新政”，希望美国在十年内停止排放温室气体，百分之百使用可再生能源。2019年3月2日，特朗普在保守派政治行动大会上将其形容为“社会主义计划”，认为这势必会重创化石燃料和汽车工业。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生态环境治理明显加强，环境状况得到改善，并成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中国是坚定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的负责任大国，珍视绿水青山，呵护地球家园。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这一坚定承诺进一步体现了中国的大国担当，受到国际社会普遍关注和热烈欢迎。

#### 四、新发展阶段生态文明建设的指导思想

在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国家的生态文明建设工作决心之大、力度之大、成效之大前所未有，取得了历史性的成就，发生了历史性变革，开创了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保护新局面。这一历史性的成就与变革根源于科学的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

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思想，是我们全党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智慧结晶。在这一思想的创立过程中，习近平总书记以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理论家的深刻洞察力、敏锐判断力和战略定力，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开创性的生态文明建设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为这一科学思想体系的创立发挥了决定性作用、作出了卓越的理论贡献，因此我们称之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对于这一思想内涵的理解，其实也有不同的概括。中央及各部门作出了很全面的论述。早在2015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当时称之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论述”，其中提出了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六个理念”：一是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理念；二是树立发展和保护相统一的理念；三是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四是树立自然价值和自然资本的理念；五是树立空间均衡的理念；

六是树立山水林田湖是一个生命共同体的理念。

2018年5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科学概括了新时代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必须坚持的“六项原则”:一是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二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三是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四是山水林田湖草是命运共同体;五是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六是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被正式确立,将党和国家对于生态文明建设的认识提升到一个崭新的高度。

2018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共同发布《关于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见》,把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总结为“八个坚持”:一是坚持生态兴则文明兴;二是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三是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四是坚持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五是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是命运共同体;六是坚持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七是坚持建设美丽中国全民行动;八是坚持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

无论是“六个理念”“六项原则”还是“八个坚持”,其实都是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一个很好的归纳总结,这个思想还在不断地发展当中,无论怎么归纳、研究,其核心理念都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是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于2005年8月在浙江湖州安吉考察时提出的科学论断。现在这个理念已经成为全党全社会的共识和行动指南,成为新发展理念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如此,这个理念在全世界传播非常广泛,2016年被写入联合国报告。但是有的人对这个理念不太理解,“是不是守着绿水青山它就能自己变成金山银山?”其实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并不能简单地划等号,二者之间需要转化,而这种转化需要把绿水青山变成一种新的资本,这种资本就是自然资本。

习近平总书记对自然资本非常重视。2003年10月,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在同浙江省委党校部分学员座谈时就指出,生态环境是资源,是资产。《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明确指出:“树立自然价值和自然资本的理念,

自然生态是有价值的，保护自然就是增值自然价值和自然资本的过程，就是保护和发展生产力，就应得到合理回报和经济补偿。”2016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强调，要坚定推进绿色发展，推动自然资本大量增值，让良好生态环境成为人民生活的增长点、成为展现我国良好形象的发力点。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自然价值和增值自然资本，就是保护经济社会发展潜力和后劲，使绿水青山持续发挥生态效益和经济社会效益。

既然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那么如何使自然资本增值呢？以浙江湖州安吉县为例，这里盛产毛竹，也是获得了四项奥斯卡奖的电影《卧虎藏龙》的取景地之一。我们去安吉考察时，队伍中有一个研究工艺美术的老师，他看见一个农民拉了一车毛竹，就花20元买了一根竹子。几天后，这个老师给我发了三张工艺品的照片，说这三件工艺品都是用毛竹做的，现在每一件都可以卖到2000元以上，也就是说在百姓眼里不起眼的一根毛竹，在工艺品老师的手里就变成了6000元以上的工艺品。这就实现了自然资本增值，绿水青山就变成了金山银山。



图 13：60 元的国产草包 VS60000 元的香奈儿草包

我们再来看图 13 所示的这两个包，同样的藤草编织包，左边的国产草包卖 60 元，右边的进口草包卖 6 万元，这就是品牌效应所带来的价值差异。所以，

我们也可以把中国的绿水青山通过品牌转化为更多的自然资本。

那么贫困的地方怎么办，尤其地处偏僻的乡村，道路都通不进去，传统的方法一般是要致富先修路，但是后来发现有的地方生态良好，路修好以后，游客数量激增反而使当地的环境遭到了破坏。其实，随着网络直播和短视频的迅猛发展，我们并不需要都把这些地方打造成旅游景点，也可以通过新媒体的传播方式，用网络经济来推动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的转化，实现自然资本的增值。贵州黔东南州有个侗族的村子，他们打造了一个特色的品牌——侗家七仙女，请侗族的七位姑娘成立了一个直播的团队。七仙女在互联网上直播，村民自家种的特色农产品和制作的手工艺品通过直播打开了销路，卖到了全国各地，仅2018年直播收入就达到30万，特色农产品的收入达到60多万，很快就实现了自然资本的增值。

## 五、新发展阶段中生态文明建设领域的挑战及对策

### （一）国内外挑战

我们所面临的国际挑战越来越复杂，《建议》指出，“国际环境日趋复杂，不确定性不稳定性明显增加”。这种国际环境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对生态环境保护领域产生了新的压力：其一，新冠肺炎疫情导致全球经济放缓，治理污染投入的减少使得全世界生态环境压力增大，我国亦是如此。其二，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对我国的遏制。其三，禁止“洋垃圾”入境政策受到发达国家的质疑。2017年7月18日，中国正式通知世界贸易组织（WTO），表示2017年底开始将不再接收外来垃圾，包括废弃塑胶、纸类、废弃炉渣、与纺织品。这一政策使得美国、加拿大、欧洲、日本和韩国在内的世界上一半的国家被迫开始寻找新的垃圾填埋场，纷纷抗议中国的这一项政策。其四，中国提倡“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坚持“一带一路”建设。但是“一带一路”建设的倡议遭到了个别国家的抹黑，他们污蔑中国要把过剩产能、污染转移到这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去。

2020年10月13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发布最新一期《世界经济展望报告》，预测2020年全球经济将萎缩4.4%。报告认为，疫情对全球经济造成严重冲击。目前新冠肺炎大流行远未结束，2020年全球经济仍将深度衰退。具体而言，IMF预测发达经济体今年将衰退5.8%，其中美国经济将衰退4.3%，欧元区经济衰退8.3%，英国经济衰退9.8%。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经济将衰退3.3%，其中印度经济将萎缩10.3%。根据IMF最新预测，中国将是世界主要经济体中唯一保持正增长的国家。同时，中国经济有望在2021年持续增长，增幅显著。

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埃斯瓦尔·普拉萨德表示，由于及时出台了大量应对危机的财政政策，世界经济避免了受到更大伤害，但剩余的政策行动空间日益显现出局限性。全球经济正从危机中恢复，未来全球经济将面临漫长、不均衡且充满不确定性的艰难爬坡之路。所以，这种背景之下，全球包括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压力也是非常大的。

我国要绿色转型，首先要转变过度依赖以煤炭为主的化石燃料的消耗，重点发展新能源，而新能源已经成为全世界非常重要的发展领域。2013年3月，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在伊利诺伊州发表他连任以来的首次能源政策讲话时提出，不能坐等中国等国在新能源领域赶上美国。因此，中美贸易战首先打击的便是我国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其中就包括新能源领域的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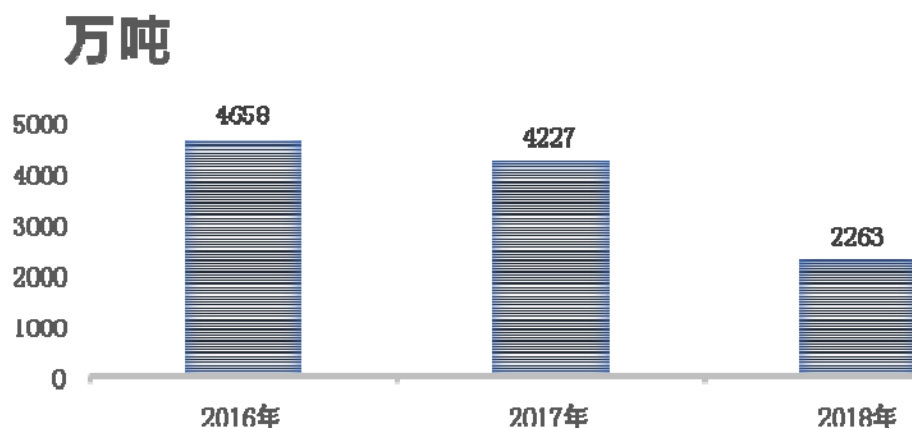


图 14：2016—2018 年中国固体废物进口量



中国是全世界最大的垃圾进口国。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的一位教授做了一项研究，在美国人扔掉的电子元器件上装传感器，通过传感器所勾画出来的路线，最后发现美国人所扔掉的垃圾都到中国 and 东南亚地区。据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的数据，2015年全世界超过70%的废塑料和37%的废纸都出口到中国。欧洲国家和美国是这些废品的主要来源地。据路透社报道，中国是全球主要的垃圾进口国家，2016年中国进口全球56%的垃圾，其中废塑料730万吨，总值达37亿美元。2017年，中国开始实施禁止洋垃圾入境的新政，旨在切实改善环境质量、维护国家生态环境安全和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如图14所示，2018年，中国固体废物实际进口量同比下降46.5%。

除了“洋垃圾”，还有更隐蔽的污染转移方式，那就是通过贸易的污染转移。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劳伦斯·萨默斯在1990年担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副行长时曾说，通过国际贸易把污染转移到发展中国家是合理的。西方主流经济学认为发展中国家承受污染的水平比较低、成本比较低，可以更多地承受一些污染，所以把污染转到发展中国家去，可以降低发达国家污染治理成本。对于发达国家的高收入的人群来说，应该享受更好的生态环境，因为他们承受污染的成本很高，这是一个扭曲价值的逻辑。事实上，发达国家就是这么做的。研究表明，2010年美国通过国际贸易向我国净转移6.7亿吨二氧化碳，欧盟各国通过国际贸易向我国净转移5.7亿吨二氧化碳，占当年我国二氧化碳总排放量的15%。

还有更可怕的产业转移。贸易是一种无形的转移，而产业转移是一种有形的污染转移。据统计，20世纪70年代以来，日本将60%的高污染产业转移到了中国、东南亚及拉美国家，美国也将39%的产业转移到了其他国家。因此，我们需要应对这种挑战，依然面临着很大压力。

国内也面临着艰巨的挑战。《建议》指出，“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重点领域关键环节改革任务仍然艰巨，创新能力不适应高质量发展要求，农业基础还不稳固，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较大，生态环保任重道远，民生保障存在短板，社会治理还有弱项。”虽然我国目前取得了许多历

史性成就，但仍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仍然面对一系列严峻挑战，还有许多需要解决的问题。

## （二）对策

### “增强全社会生态环保意识，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现在，仍有一部分地市级特别是县区级党委和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对绿色发展认识不高、能力不强、行动不实，还是重发展轻保护。生态文明问题不仅仅是生态环境的问题，已经上升到重大的政治问题。以秦岭的生态环境保护为例，习近平总书记对秦岭生态环境保护和秦岭违建别墅严重破坏生态问题先后六次作出重要批示指示。

2014年5月13日，习近平总书记就秦岭北麓西安段圈地建别墅问题作出重要批示，要求陕西省委省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关注此事。接到总书记的重要批示，时任陕西省委主要领导没有在省委常委会上进行传达学习，也没有进行专题研究，只是简单地批示省委督查室会同西安市委尽快查清、向中央报送材料。时任省政府主要领导也只是进行了圈阅，也没有把总书记的批示的精神真正地传达下去。

虽然陕西省在2014年8月向党中央报告说，秦岭违建别墅的数量已经查清。但是，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10月13日又作出重要批示，“务必高度重视，以坚决的态度予以整治，以实际行动遏止此类破坏生态文明的问题蔓延扩散”。然而，陕西省委和西安市委还是没有引起真正重视。

从2015年2月到2018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又作过三次重要批示指示。其中，2016年2月，在对祁连山自然保护区和木里矿区生态环境综合整治所作的重要批示中，就专门提到秦岭北麓西安境内圈地建别墅问题，并且强调“对此类问题，就要扭住不放、一抓到底，不彻底解决、绝不放手”。

2018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对秦岭违建别墅作出第六次批示，“首先从政治纪律查起，彻底查处整而未治、阳奉阴违、禁而不绝的问题”，直接将之提到了“政治纪律”的高度。当月下旬，中央专门派出专项整治工作组入驻陕西，与当地省、市、区三级政府联合开展针对秦岭违建别墅的整治行动。

2020年4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位于秦岭山脉东段的牛背梁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羚牛谷,了解秦岭生态环境保护情况。随后,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当好秦岭生态卫士,决不能重蹈覆辙,决不能在历史上留下骂名。要自觉讲政治,对国之大者要心中有数,关注党中央在关心什么、强调什么,深刻领会什么是党和国家最重要的利益、什么是最需要坚定维护的立场。”因此,我们要扭转从前不重视生态文明建设的态度,要把生态文明建设提升到政治高度。

**“强化国土空间规划和用途管控,落实生态保护、基本农田、城镇开发等空间管控边界,减少人类活动对自然空间的占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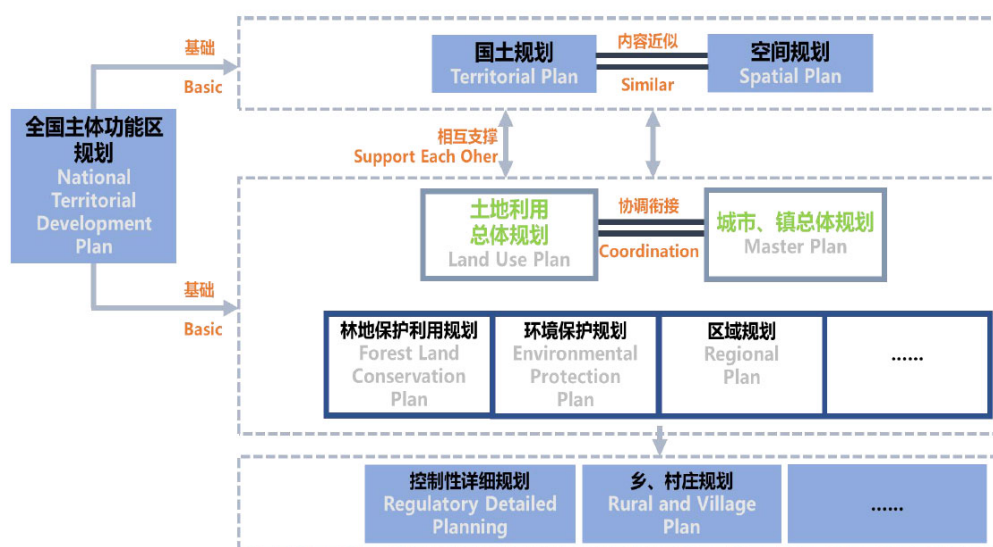


图 15: 工业时期的规划之困

从前在规划领域出现了很多问题,我们将其概括为“工业文明时期的规划之困”。国土规划和空间规划应该是一体的,但是我们人为地把它分割开来;土地规划和城镇总规划应该是协调衔接的,但很多地方的规划和耕地保护规划、环境保护规划、区域规划是脱节的,没有真正按规划统一来实施,出现了诸多的问题。因此,党中央提出要构建国土空间规划体系。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要“建立空间规划体系,划定生产、生活、生态空间开发管制界限,落实用途管制”,以及“完善自然资源监管体制,统一行使所有国土空间

用途管制职责”。2015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提出，要“构建以空间规划为基础、以用途管制为主要手段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制度”。党的十九大报告进一步指出，“构建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制度，完善主体功能区配套政策，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2019年1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若干意见》强调，要“建立全国统一、责权清晰、科学高效的国土空间规划体系”。

国土空间规划是国家空间发展的指南、可持续发展的空间蓝图，是各类开发保护建设活动的基本依据。国土空间规划是对一定区域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在空间和时间上作出的安排，包括总体规划、详细规划和相关专项规划。国家、省、市县编制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各地结合实际编制乡镇国土空间规划。相关专项规划是指在特定区域（流域）、特定领域，为体现特定功能，对空间开发保护利用作出的专门安排，是涉及空间利用的专项规划。国土空间总体规划是详细规划的依据、相关专项规划的基础；相关专项规划要相互协同，并与详细规划做好衔接。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将主体功能区规划、土地利用规划、城乡规划等空间规划融合为统一的国土空间规划，实现“多规合一”，强化国土空间规划对各专项规划的指导约束作用，是党中央、国务院作出的重大部署。确保“多规合一”能够有效地维护国土空间规划的唯一性，防止出现换一届党委和政府改一次规划的情况。

要自上而下编制各级国土空间规划，对空间发展作出战略性系统性安排。各地不再新编和报批主体功能区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城镇体系规划、城市（镇）总体规划、海洋功能区划等。坚持先规划、后实施，不得违反国土空间规划进行各类开发建设活动。要依托国土空间基础信息平台，建立健全国土空间规划动态监测评估预警和实施监管机制。

**“治理城乡生活环境，推进城镇污水管网全覆盖，基本消除城市黑臭水体。推进化肥农药减量化和土壤污染治理，加强白色污染治理。”**

环境领域也和经济领域一样，也面临着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部分地区

和领域环境治理基础薄弱，大气环境质量改善难度加大，水环境质量改善程度不高，城乡发展和环境治理不平衡，农村人居环境“脏乱差”现象仍然突出。

	优良比例天数				PM <sub>2.5</sub> (微克/立方米)			
	2018年	同比 变幅	2019年 1—10月	同比 变幅	2018年	同比 变幅	2019年 1—10月	同比 变幅
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	79.3%	↑1.3	82.2%	↓2.4	39	↓9.3%	34	持平
京津冀及周边地区“2+26”城市	50.5%	↑1.2	52.0%	↓7.1	60	↓11.8%	53	↑1.9%
北京市	62.2%	↑0.3	62.5%	↓3.6	51	↓12.1%	41	↓10.9%

表 1：2018 年和 2019 年 1—10 月全国雾霾治理情况

区域之间存在环境治理差距。现在有的地方，尤其是珠三角、长三角一带，雾霾（PM<sub>2.5</sub>）的治理已经取得不错的成效，但是京津冀地区压力依然很大。表 1 是生态环境部公布的一组数据。2019 年 1—10 月，京津冀及周边地区“2+26”城市平均优良天数还出现了略有上升的情况。

**农村人均耕地占有量少。**我国农业农村的资源占有量较少，人均耕地占有量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 38%，水资源人均占有量只有 2300 立方米，约为世界人均水平的 1/4，是世界上 13 个贫水国之一。水土资源分布不合理，南方地区每平方公里拥有水资源 67.1 万立方米，北方地区仅有 8.7 万立方米，南方地区是北方地区的 7.7 倍，有地没水、有水没地的资源不匹配矛盾比较突出。我们常说的胡焕庸线，从黑河到腾冲，南北分割，这条线的右侧，东部地区水资源蕴含量很大，而西北部地区水资源量非常少。据统计，全国因水土流失、贫瘠化、次生盐渍化、酸化导致耕地退化面积已占总面积的 40%以上，90%的天然草原出现不同程度沙化、退化、盐碱化，其面积还在逐年增加。

**农业面源污染问题日趋严重。**自 2007 年第一次污染普查以来，我国农业面源污染虽然局部改善，但总体恶化的趋势在加剧。我国农业面源污染是多因素叠加造成的，主要有化肥、农药、畜禽水产养殖、农作物秸秆与废旧地膜。五大污染源造成了南方地表水富营养化、北方地下水硝酸盐污染、海洋赤潮、绿潮频发等一系列恶性生态环境事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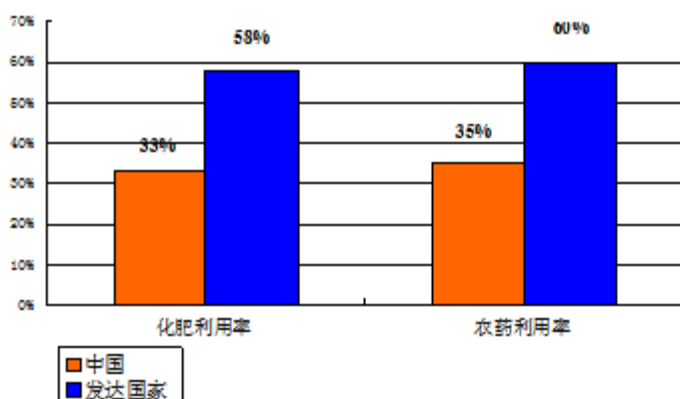


图 16：我国和发达国家化肥利用率和农药利用率

一是化肥。目前，全国化肥使用量达六千万吨左右，占世界用量的 1/3，农作物亩均化肥用量为 17 公斤，施肥水平高于世界主要国家，尤其是果园和设施蔬菜化肥过量施用现象较为突出，且作物养分利用率较低。其中，大田作物的氮肥利用率不足 40%，而在蔬菜、花卉、水果等经济作物农田上，氮肥利用率只有 10%左右，较欧美等发达国家低 10%~30%。过量施肥、盲目施肥不仅增加农业生产成本、浪费资源，也造成耕地板结、土壤酸化，污染了水体，加大了农业源温室气体的排放。二是农药。全国农药使用量近年来稳定在 32 万吨（有效成分）左右，占世界农药总用量的 1/7，农药利用率仅为 35%，低于发达国家 20%~30%，有 60%至 70%残留在土壤中，全国约有 1.4 亿亩耕地受农药污染。农药的大量和不合理施用，污染了农业生产环境，影响了农产品质量安全，对生物多样性也造成严重威胁。三是畜禽水产养殖。近年来，全国畜禽养殖总量不断上升，全国每年产生 38 亿吨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不到 60%，畜禽粪便未经处理直接露天堆放，对水体环境构成了严重威胁。我国渔业持续较快发展，水产品产量大幅增长，养殖水产品产量占水产品总产量的 70%以上，大量饵料、鱼药的使用也会造成集中养殖区域水环境污染。四是农作物秸秆。全国每年秸秆可收集量约 9 亿吨，综合利用率为 80.1%，未被利用的秸秆，随意丢弃或露天焚烧，既污染了环境，又浪费了资源。五是废旧地膜。我国地膜使用总量和作物覆盖面积均高居世界第一。全国农膜用量为 260 余万吨，其中地膜使用量 145 万吨，但当季农膜回收率尚不足 2/3。然而，生物降解地膜由于成本高、不

稳定等因素，导致推广难度大、范围小。随着地膜投入量和应用面积越来越大，农田残留地膜污染已呈现日趋严重的态势，“白色污染”问题日益凸显，造成土壤结构破坏、耕地质量下降、作物减产、品质降低以及农事操作受阻等一系列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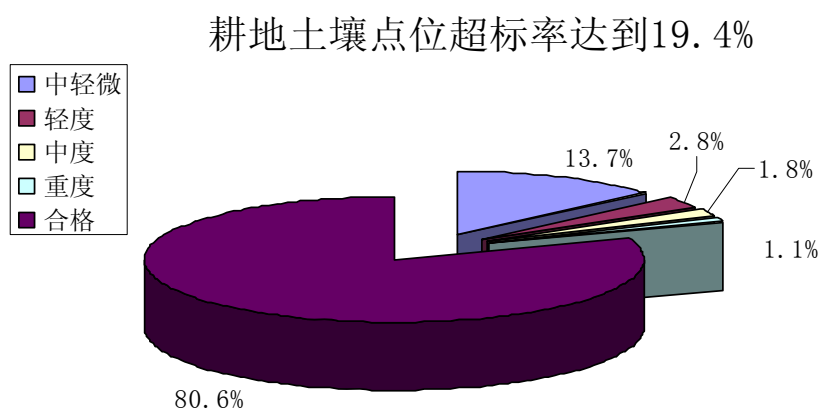


图 17：耕地土壤点位超标率达到 19.4%

**土壤污染较为严重。**原环保部 2014 年公布的数据显示，我国耕地土壤点位超标率已经达到 19.4%，但这仅仅是抽样调查所显示的污染率，整体的污染率有可能更高，全国受污染耕地超过 1.5 亿亩，因污水灌溉而污染的耕地有 3250 万亩，因固体废弃物堆存而占地和毁田的有约 200 万亩，合计受污染面积占耕地面积的十分之一，其中多数集中在经济较发达地区。

**农田的生物多样性保护遭到破坏。**我国是全球 12 个生物多样性特别丰富的国家之一。我国传统农业间作套种、农林农牧复合、多层种养、多样化和生态化的农田景观，具有丰富的生物多样性，较高的生态服务功能。但近几十年种养脱节的高度集约化生产和土地整治，过量施用农业化学品，农田种植过度强调单一品种，农田基础设施过度硬化，防护林树种和结构单一等因素，造成水土污染、农田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降低、农田景观单调。如在南方农业集约化地区，水田黄鳝、泥鳅、青蛙、鸟类、蛇、土壤蚯蚓、蜘蛛、步甲、蝴蝶和蜜蜂等有益生物大量减少，导致其天敌和害虫数量变化极度不平衡。农田生物多样性的丧失导致农田自我修复和恢复的功能严重受损，抵御病虫害、自然灾害的能力严重降低，农业生产对化学品投入品的依赖越来越严重，部分地区形成

了恶性循环。

**农作物品质和食用安全性受到严重威胁。**例如，作物长期在被硝酸盐污染的环境中生长，使其中（尤其蔬菜）氮氧化物含量严重超标，而氮氧化物在人畜体内会形成致癌物质亚硝胺，严重危害人体的健康。2016年1月，中国工程院发布的《中国食品安全现状、问题及对策战略研究》项目成果显示，农药化学污染物是当前我国食品安全源头污染的主要来源，2013—2015年，全国31个省会城市146种水果蔬菜农药检出率为54%至96.9%；养殖环节存在滥用抗生素类药物的现象；重金属、真菌毒素等污染物构成粮食食品安全长远隐患，部分省份粮食重金属污染超标率严重；每年有3100万公顷粮食在生产、储存、运输过程中被真菌毒素污染，约占粮食年总产量的6.2%。

**“强化多污染物协同控制和区域协同治理，加强细颗粒物和臭氧协同控制，基本消除重污染天气。”**

现在生态环境质量受自然条件变化影响较大：气象条件对PM2.5浓度的影响，年际可达±10%，对个别城市可达±15%，月际可达±30%以上，尤其是京津冀地区影响非常明显。其实北京治理污染的力度已经很大，成效也很显著，但是仍然存在“三天不刮西北风就出现雾霾”的问题。此外，还出现了一个更严峻的问题，就是一种污染物治好了，另外一种或多种污染物却上升了。比如说这些年有些地区PM2.5治理好了，但是又出现了一种重污染物质——臭氧。

“加强细颗粒物和臭氧协同控制”就是加强对PM2.5和臭氧的协同治理。关于臭氧有一种说法，“在天为神，在地为魔”。近年来，我们通过减少空调中氟利昂的排放，使臭氧层的空洞逐步缩小。臭氧在大气层里是一种好的物质，但是当这种气体接近地面时，就会对人的心脏和肺部造成巨大伤害。在紫外线的作用下，氮氧化物和挥发性有机物叠加起来导致臭氧增加，而我们这些年雾霾治理得较好，空气比较清新，阳光比较充足，紫外线含量就增加了，紫外线含量的增加就会间接导致臭氧的增加，臭氧的增加又会增加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和有机挥发物，又会导致雾霾的增加，产生恶性循环。所以我们必须以科学的眼光进行协同治理，而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这需要系统化的思维，



这也是为何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实现主要目标要贯彻系统化原则。

**“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加强外来物种管控。”**

2020年9月30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峰会上通过视频发表重要讲话,指出“生物多样性关系人类福祉,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基础”。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提醒人类,要更加注重生物安全。

生物安全是由病毒、细菌、真菌、植物、动物、转基因生物等生物因子通过自然因素或人为因素引发人类传染病疫情、动植物疫情、生物多样性的破坏、外来物种的入侵等对人类种群、国家主权、军事国防、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科学技术、公共健康与生态环境所产生的风险。

2019年,我去青海三江源考察调研,了解到当地发生过222起“人兽冲突”。所谓“人兽冲突”就是狗熊把人打死了。生态学里最基本的规律就是生态平衡,一种物种太少或太多都不行。近年来,三江源地区自然生态环境保护得较好,但也出现了野生动物过多的情况,这些野生动物诸如熊的生态空间变小了,就开始侵扰人类。

在美国密歇根州也出现过类似问题,黑熊的数量过多。政府所采取的应对措施是把黑熊的狩猎权开发成一种权利进行拍卖,谁出价高谁就买走黑熊的狩猎权,结果形成一个多赢的局面。其一,政府再也不用派公务员去打黑熊;第二,原来偷猎的猎人成为了合法的狩猎人,可以带着猎犬去打黑熊;第三,拍卖所得使政府获得一大笔收益,用来弥补每年投入黑熊保护的财政支出。国外有些猎人已经形成良好的行业自律,狩猎权规定几个,他们就打死几个,也不打小的和母的,是真正的生态保护主义者,因此也推动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

生物安全还有很多需要注意的地方,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就是从野生动物传播过来的。要给自然多留点空间,合理保护好野生动物,建立起人类和野生动物的安全边界。

基因编辑技术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可以推动人类科技的发展,另一方面也会带来很多的伦理问题,甚至生物安全的问题。

国家对我国人类遗传资源和生物资源享有主权。这是我们以前忽视的,它

也是生物安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国家应加强对我国人类遗传资源和生物资源采集、保藏、利用、对外提供等活动的管理和监督，保障人类遗传资源和生物资源安全。

**“完成重点地区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搬迁改造。重视新污染物治理。”**

2019年江苏响水化工厂爆炸事件表明，有毒有害的化学品已经出现在我们生产生活的诸多环节中。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报告指出：有毒化学品是五大死亡原因之一，每年造成超过100万人死亡。世界卫生组织研究表明：化学污染因素约占致癌因素80%。因为不断有很多新污染物产生，所以我们要坚决打好污染防治的攻坚战，不断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迈上新台阶。

《建议》高度肯定了“十三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所取得的历史性成就，以高瞻远瞩的顶层设计擘画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未来蓝图。同时，对生态文明建设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要求、新目标并作出新部署，为我们做好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各地的生态文明建设应遵循《建议》要求，抵御各种风险挑战，进一步破浪前行，为我国早日实现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而共同奋斗。

根据“学习中国”报告录音整理

责任编辑：采尔 文韬 肖丽芬 钟雪

## 充分发挥党支部的主体作用， 担负起教育、管理、监督党员的职责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党的建设教研部教授 王 瑜

**摘 要：**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对党支部建设十分重视。早在党成立之初，我们就有类似于支部的基础组织，当时不叫支部，而是叫“组”或者是“小组”，也就是支部的前身。党建工作对我们的业务工作有促进作用，对我们高质量发展有推动作用。如果人有了“能干事”的精神头，有了对自身价值的追求，他的热情肯定会更加饱满。

**关键词：**党支部；马克思主义政党；党建；管理

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我们党非常注重加强党的组织建设。我们的党组织是由三个层次构成：党的中央组织、党的地方组织和党的基层组织。

党的中央组织即中央一级党的组织。根据党章规定，党的中央组织包括：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及其产生的中央委员会、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由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选举产生的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由中央委员会决定的中央军事委员会，以及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提名、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央书记处。总之，中央组织包括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中央委员会、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以及中央军事委员会和中央书记处。

中央组织的下一个层次是地方组织。党的地方组织是指党的省、自治区、直辖市，设区的市和自治州以及县（旗）、自治县、不设区的市和市辖区的代表大会和它们所产生的委员会，还包括经党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纪律检查委员

会。总之，地方组织包括党的地方党委、地方党代会，还有地方的纪律检查委员会。

地方组织的下一个层次是基层组织。党的基层组织是指党的基层委员会、总支部委员会、支部委员会。它是根据工作需要和党员人数，经上级党组织批准而建立起来的。党章规定，企业、农村、机关、学校、科研院所、街道社区、社会组织、人民解放军连队和其他基层单位，凡是有正式党员三人以上的，都应当成立党的基层组织。

地方组织实际上都是在区域设置的，每个行政区域中都有地方组织。基层组织也是在区域设置的，但是在更为基层的区域，比如说村、社区、街道，这是在区域设置的基层组织，绝大部分的基层组织实际上都是以单位为单位的，都是设立在各种形式的单位之中。

从数量上来说，党的全国基层组织是比较庞大的。习近平总书记曾经说过：“我们共产党可以说是全世界最重视基层的党。”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基层党组织是我们党作为执政党直接联系社会的一个纽带。

每年在“七一”前后，中组部都会向全社会公布党的基本情况、基本数据。截至2019年12月31日，中国共产党现有基层党组织468.1万个。其中党的基层委员会是24.9万个，总支部委员会是30.5万个、支部委员会是412.7万个。全国共有党的各级地方委员会3202个。那么我们党的地方组织实际数量是3202×3，因为除了地方党委之外，还有地方的党代会和地方的纪委。这3202个党的各级地方委员会中，省（区、市）委31个，市（州）委397个，县（市、区、旗）委2774个。基层党组织包括党的基层委员会、总支部委员会、支部委员会，这是它们的数量情况。

## 一、加强党支部建设的重大意义

支部委员会也就是党支部，是属于基层组织的一个组织。对于党支部的重要性，党章规定，党的基层组织是党在社会基层组织中的战斗堡垒，是党的全

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支部是我们党深深根植于社会的根，是最前沿的纽带。

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对党支部建设十分重视。早在党成立之初，我们就有类似于支部的基础组织，当时不叫支部，而是叫“组”或者是“小组”，也就是支部的前身。

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建立这样的基层组织？这个“组”和“小组”到底发挥什么作用？1922年，党的二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是党成立后的第一个党章。二大党章第四条规定：“各组组织，为本党组织系统，训练党员及党员活动之基本单位，凡党员皆必须加入。”我们党强调，党员入党以后必须隶属于一个基层组织，必须参加组织活动，同时要接受组织的教育。尤其是当时党建立的时候是一个工人阶级的政党，在一个农业人口占多数的国家，我们要教育党员，摆脱小农意识。所以从一开始中国共产党有这样的组织设置，这个组织的职责实际上就是教育党员、组织党员进行活动。

“支部”这个词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呢？是在1925年党的四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修正章程》中出现的。章程第一次将党的基层组织由党的“小组”改为党的“支部”。章程第五条规定：“各农村各工厂各铁路各矿山各兵营各学校等机关及附近，凡有党员三人以上均得成立一支部，每支部公推书记一人或推三人组织干事会，隶属地方执行委员会，不满三人之处，设一通信员，属于附近之地方或直接属于中央。支部人数过多时，得酌情形分为若干小组，每组设组长一人，由支部干事会指定之。”这就是“支部”这个词首次出现的情况，同时，章程对“支部”的构成也做了明确的规定。

1926年在上海召开的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扩大会议，通过了《组织问题议决案》，第一次提出“一切工作归支部”的口号。这实际上就是强调支部的作用。

1927年，党的五大没有专门讨论修改党章的问题。五大闭幕后不久，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27年6月1日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修正章程议决案》。修正议决案对第一次将“党的支部”单独列为一章，强调“支部是党与群众直接发生关系的组织”，并且对支部的任务作出了新的规定。这实际上就是说通

过党章规定，支部的职责发生了新的变化，支部不仅仅是训练党员及党员活动的基本单位，同时支部也要加强与群众之间的联系，学会做群众工作。

大革命失败后，1927年9月，毛泽东同志在率秋收起义余部挺进井冈山途中，有感于南昌、秋收起义相继失败，总结道：“这是缺乏革命中心力量招致革命失败的血的教训。”毛泽东同志认识到我们之所以革命遭遇失败，就是因为我们缺乏党对军队的领导。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我们十分注重与群众之间的联系，加强对人民群众的宣传、教育，但是我们忽视了对权力的掌控，尤其是对军队的掌控，所以当时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我们要掌握权力。毛泽东同志也看到，如果一个连队中党员人数比较多，而且形成比较有利的组织的话，那么这样的连队即使吃了败仗，也不容易被打垮。但是相反，如果连队里面党员人数少，又没有形成组织合力，这样的连队，一旦吃了败仗，很快就会溃不成军，甚至作鸟兽散，脱下军装回家务农。

有了这样的教训和总结，毛泽东同志率领秋收起义部队到达江西省永新县三湾村改编部队时，首次提出了“把党的支部建在连上”的思想，第一次把党的政治建军设想付之于实践。1929年底，古田会议把“支部建在连上”这一原则写入决案，成为建党建军的基本原则和制度。

古田会议为什么是我们党历史上一次很重要的会议？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它把“政治建军”的原则写入了我们党正式的文件中，而且成为一项制度确定下来。“支部建在连上”也是确保党取得最终胜利的组织保障。所以毛泽东同志曾说：“红军所以艰难奋战而不溃散，‘支部建在连上’是一个重要原因。”实际上，“支部建在连上”的原则，不仅仅成为“党指挥枪”的重要原则，成为“政治建军”的重要原则，也成为我们基层组织建设的组织制度。

后来我们在根据地的时候，有很多企业，像兵工厂、服装厂……这些企业中也要建支部，支部建在企业中。因此，现在强调国有企业要加强党的建设，对国有企业的全面领导也是我们的一个优良传统，并不断把它延伸。比如党取得政权胜利以后，在计划经济时期，我们的支部建在单位，那个时候整个社会被整合成了各种形式的单位，无论是全民所有制的企业，还是集体所有制的企

业，实际上都是单位，包括农村的生产队、人民公社。进入市场经济以后，出现了各种组织形式，不再只是有单位，还出现了一些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我们也强调支部要建在这些组织中。在市场经济以后，人员的流动越来越频繁了，我们要建立流动党员党支部，还有一些重大的工程、临时的项目也要建党支部，支部就建在项目上、建在工程上。这是“支部建在连上”的贯彻落实。

关于“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是什么时候提出来的呢？1939年6月10日，时任中央组织部部长的陈云同志在中共中央机关刊物《解放》第73期发表的《支部》一文中指出，“支部不但要在组织形式上具有核心的堡垒的姿态，而且要在实质上真正能起核心的堡垒的作用”。这样就必须建立起支部的基本工作，并分配和责成每个党员去执行。这是党的历史上第一次提出“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

1945年，刘少奇同志在党的七大上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提出：“在一个工厂、矿山、农村、企业、街道、机关和学校中，不论党员有多少人，从三个党员起，到几千个党员止，都只成立一个统一的党的组织，成为党的基础组织，成为党在这个工厂、矿山、机关和学校等等群众中的战斗的堡垒。”

党的基础组织一般称为党的支部，党的七大通过的党章中明确了党的基础组织是党的支部。“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到底指的是什么？支部的任务是什么？

第一项任务是在人民群众中进行宣传和组织工作，以实现党的主张和上级组织的各种决议。实际上就是做群众工作，什么叫群众工作？就是组织动员群众实现党确定的目标，这就是做群众工作，支部就是要做群众工作的。

第二项任务是经常注意并向上级机关反映人民群众的情绪和要求，关心人民群众之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生活，并组织人民群众来解决他们自己的各种问题。支部要成为民情民意的表达渠道，要把民情民意向上级机关、上级组织去表达。

第三项任务是吸收新党员，征收党费，审查与鉴定党员，对党员执行党的纪律。

第四项任务是教育党员，组织党员的学习。

我们可以看到支部的这四项任务，两项是面向群众的，两项是面向党员的。支部不仅仅是做党务工作，去宣传教育党员，同时支部也要联系群众，学会做群众工作。

1977年，党的十一大首次在党章中提出“党的基层组织要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同时，党章还具体规定了包括支部在内的基层党组织的6项基本任务。这实际上就是包括党支部在内的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的基本特征与具体内容要求。

不论是在民主革命时期，还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党都把制度建设放在重要位置。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对制度建设在党的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有了更加清醒和深刻的认识，使支部建设的实践与理论不断得到深化与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党支部建设，要求把全面从严治党落实到每个支部、每名党员。苏联解体的原因之一，就是党的基层细胞坏死了，失去功能了。2017年3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的意见》指出，“要树立党的一切工作到支部的鲜明导向，注重把思想政治工作落到支部，把从严教育管理党员落到支部，把群众工作落到支部”。党的一切工作到支部，就是要发挥支部的作用。

党的十九大报告进一步明确指出：“党支部要担负好直接教育党员、管理党员、监督党员和组织群众、宣传群众、凝聚群众、服务群众的职责，引导广大党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

党的十九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又强调了支部的职责。党章修正案共修改107处。条文部分增加了两条，由原来的53条变成了55条，增加的这两条，一条是关于巡视全覆盖，另一条是关于支部的职责，强调支部要担负直接教育党员、管理党员、监督党员和组织群众、宣传群众、凝聚群众、服务群众的职责。



2018年10月，中共中央印发了《中国共产党支部工作条例（试行）》（以下简称《条例》）。《条例》的出台与党章的修改是密不可分的，党章作为最根本的党内法规，是管党治党的总规矩，其规定往往是原则性的、方向性的。比如党章中关于支部的职责就是一句话，“党支部是党的基础组织，担负直接教育党员、管理党员、监督党员和组织群众、宣传群众、凝聚群众、服务群众的职责”。但是如何贯彻落实党章的要求，需要其他党内法规把党章的原则进一步细化。因此，出台《条例》就是以党章为根本遵循，把党章的要求具体化，例如，党支部工作有哪5大原则？党支部的工作机制有哪些？如何加强党支部委员会建设？党支部的8项基本任务是什么？党支部应开展哪些组织生活？党支部工作如何保障和落实？这样，我们在实践中才能真正能够把支部建好、建强，让支部能够发挥好党章所要求的职责。

## 二、抓好党员教育、管理、监督的方法

### （一）充分调动全体职工积极性，大力加强党支部建设

首先，支部要想更好的履行职责，必须充分调动全体职工的积极性，大力加强党支部建设。支部的工作既面向党员也面向群众，支部要想发挥作用，需要动员各方力量。尤其是我们党的基层党组织，不仅数量多，而且千差万别。比如说设在党政机关的支部和设在企业的支部，就有很大差别。设在国有企业、央企的支部，和设在民营企业的支部，也有很大差别，还有包括流动党员党支部，不同类型的支部是千差万别的。因此，党建工作不仅要有顶层设计，同时也要依靠基层根据本单位的实际情况进行创新。要发挥全体职工的积极性，首先就是要发挥好党员领导干部的头雁作用。党中央强调，重视党支部、善抓党支部，是党员领导干部政治成熟的重要标志。《条例》对党员领导干部提出了要求，指出党员领导干部应当带头参加所在党支部或者党小组组织生活。党的十八大以来，总书记以普通党员的身份去过组织生活，媒体也报道了多次，这实际上是以上率下的示范。作为党员领导干部，我们要发挥好这样的作用。《条

例》也强调，党员领导干部应当定期为基层党员讲党课，党委（党组）书记每年至少讲1次党课，各级党委（党组）书记应当带头建立党支部工作联系点，带头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发现和解决问题，总结推广经验等。这都可以看到条例对党员领导干部发挥以上率下示范作用提出来的要求。

其次，要选好配强党支部领导班子。支部工作要做好，支部要建好、建强，领头羊就很重要。《条例》对党支部书记的选拔途径、产生方式、职责、培训、奖励等方面，都提出了很具体的要求。过去有人觉得支部书记随便什么人都可以干，但是现在必须改变这种看法。改变做法就是选好配强党支部领导班子，只有这样，支部才能够建好建强。

最后，就是要充分调动全体党员和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 （二）强化党支部的政治功能

党支部的政治功能就是支部的魂，党支部是党的组织结构中的一部分。什么叫政党？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政党。政治组织的政治属性肯定是第一位，这跟其他的社会组织、经济组织是不一样的，世界上所有的政党都是讲政治的。比如说美国的政党，虽然美国的政党跟其他政党差别很大，其党员不用交纳党费，入党也不用经过严格的程序，在做选民登记的时候，选择支持民主党或者共和党，就自然而然地成为自己支持的政党的党员了。下次再选举的时候，选民可能又觉得另外一个政党更好一些，又转而支持另外一个政党，自然而然地就成为另外一个政党的党员了。

而且，美国的政党，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其党代会都不是党的最高权力机构。虽然，每个选举年的七八月份都会召开党代会，但事实上这个党代会没有权威，召开党代会的目的是把经过初选产生的本党的总统候选人向全社会公布。党代会也会通过竞选纲领，但实际上竞选纲领对本党的总统候选人是没有什么太大的约束力的。党代会召开，意味着总统的选举进入白热化阶段，在此之前的选举是党内的竞争，党内成员去竞争本党的总统候选人。党代会之后，就是党与党之间的竞争，激烈程度就增加了，这就是美国政党党代会的作用。

政党都是要讲政治的，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我们的先进性也体现在政治上，我们有崇高的政治理念的追求，有高尚的政治品质的要求，我们在政治上的要求更高一些，标准更高一些。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政治上的先进性是不能够丢失的。

作为党支部来说，也是要讲政治的，加强党支部建设，也要强化党支部的政治功能。那么党支部的政治功能到底指什么？实际上党内所有的政治问题归根到底就是对党是否忠诚的问题。强化政治功能，就是要把群众组织起来，把党员凝聚起来，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党支部的政治功能就是要保落实。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以后，我们有了“十四五”规划，有了很多具体目标，要实现这些目标，就需要把各方的力量动员起来，大家要万众一心，朝着共同的目标努力。这就需要党支部把党员、把群众组织起来、动员起来，去实现我们党的目标。这是党支部的政治功能。

### （三）抓好党员理想信念教育

中国共产党很注重对党员的教育，当初成立支部的前身“组”和“小组”时，规定就很明确，这个“组”和“小组”就是对党员进行教育的地方。过去，中国是一个农业人口占多数的国家，建立一个工人阶级政党，要摆脱小农意识，就需要去教育。1844年，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指出，“先进理论不会自发产生”；习近平总书记也强调，“一个党员的党性，不是随着党龄增长和职务提升而自然提高的，不加强修养和锤炼，党性不仅不会提高，反而会降低，甚至可能完全丧失”。因此，对党员的教育应该是终身教育，教育党员是支部的职责，作为党员，接受组织的教育、终身教育，也是党员应尽的义务。

我们党一路走来，一直不断地去抓教育，经常开展主题教育，并要求把主题教育常态化长期化坚持下去。比如，我们党从2019年6月开始，在全党自上而下分两批开展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中国共产党党员教育管理工作条例》对党员教育基本任务有明确阐述：一是加强政治理论教育；二是突出政治教育和政治训练；三是强化党章党规党纪教育；四是加强党的宗旨

教育；五是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六是开展形势政策教育；七是注重知识技能教育。从支部对党员的教育内容上来看，政治内容占比重较大，所以支部组织党员学习，为了增强吸引力，可以和业务学习结合起来，但是一定要认识到不能够用业务教育、业务学习去取代政治理论学习。

教育党员要达到什么样的目标？《条例》中关于党支部的基本任务也明确强调，对党员进行思想政治教育，要“突出政治教育，提高党员素质，坚定理想信念，增强党性”。教育党员的一个很重要的目标就是要坚定党员的理想信念，增强党员的党性修养。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理想信念坚定，骨头就硬，没有理想信念，或理想信念不坚定，精神上就会‘缺钙’，就会得‘软骨病’”，“就可能导政政治上变质、经济上贪婪、道德上堕落、生活上腐化”。坚定的信仰始终是党员、干部站稳政治立场、抵御各种诱惑的决定性因素。有些领导干部之所以走向违纪违法、腐化堕落的深渊，从根本上讲是因为世界观、人生观这个“总开关”出了问题，丧失了拒腐防变的能力。

党的十八大以来，媒体公布了一些贪官落马后写的忏悔书，他们在忏悔书中首先都会强调信念问题，纪委的通报中讲一些领导干部之所以出问题主要是理想信念完全丧失。比如，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原党委书记、董事长赖小民，中央纪委关于他的通报中就称其“理想信念完全丧失，党性原则荡然无存”。

也有毫无政治理念的，比如司法部原党组成员、政治部原主任卢恩光。他在交代材料中说，万般皆下品，惟有当官高，他一心想当官，通过金钱谋取升迁之道，到处请客送礼，甚至直接送钱，最终以行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2年。卢恩光还造假，被称为五假干部：年龄造假，1958年出生的卢恩光档案里面写的是20世纪60年代；入党材料造假，他是1992年入党，但谎称是1990年入党，还伪造了入党志愿书；学历造假，卢恩光是高中毕业，结果档案里面写的是某个著名研究院研究所的博士；还有工作经历以及家庭情况的造假。

还有一些党员领导干部甚至高级干部，不信马列信鬼神，把一些“大师”

奉为自己的座上宾，对“大师”一掷千金。比如，宁夏的一个厅局级领导干部，这个人发现组织调查他，一般来说这种情况下最明智的举措应该是向组织坦白交代情况，获取宽大处理，而他却跑去找“大师”，想求“大师”帮他躲过这一劫，“大师”就给了他一个符，吩咐他带在身上，7天以后将其烧成灰，再把灰喝下去，结果他就按照“大师”的要求去做，事实证明“大师”不可能保他平安，他还是落马了。再比如黑龙江省原政协主席韩桂芝，她在家里面设了一个佛堂，佛堂里面还供着三种佛，泥佛、瓷佛、金佛，从早到晚香火不断，她还借外出开会考察之机，跑遍各地名山古刹、佛教圣地。后来她被“双规”以后，不检讨自己，而是怪菩萨。不信马列信鬼神，这是理想信念缺失的表现。

信仰的力量是很强大的，我们党刚成立的时候，全国的党员只有58名，一路走过来，经历了各种曲折。有资料显示，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牺牲的党员共有370多万人。夏明翰烈士在他的《就义诗》中讲：“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方志敏烈士也《可爱的中国》中讲：“敌人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决不能动摇我们的信仰！因为我们信仰的主义，乃是宇宙的真理！为着共产主义牺牲，为着苏维埃流血，那是我们十分情愿的啊。”这些人连牺牲自己的生命都不怕，是什么激励着他们、支撑着他们？就是信仰的力量。

老一辈革命家中，有些人家境较好，但他们还是投身革命，其目的当然不是为了自己的荣华富贵，相反他们已经有了荣华富贵，反而投身革命要舍弃这些繁华，是什么激励着他们、吸引着他们？这就是主义的力量，信仰的力量。

朱德同志的家境比较贫寒，但他入党之前担任过滇军旅长、云南陆军宪兵司令部司令官、云南省警务处长兼省会警察厅长等职，因此他的入党经历十分曲折。他听说中国共产党成立了，中国共产党是为劳苦大众谋利益的，就十分想入党，他先去找了陈独秀，跟陈独秀表明了他的心愿，陈独秀特别高兴。但一听他在军阀里面担任这么重要的职务，就拒绝了他。朱德被拒绝了以后，没有动摇，又几经曲折，先到法国又到德国找到了周恩来同志表达了愿望，周恩来接纳了他。所以这些人投身革命，不是出于自己的一己私利，而是有这样的

信仰，有这样的追求，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这种信仰的力量也决定了人一生的发展道路。

习近平总书记说“三观”问题就像我们衬衫的第一个扣子，如果第一个扣子扣歪了，那么下面的路都会走歪。党的一大的13名代表走出了不同的人生道路。为什么会出现不同的人生道路？究其根源，信仰虽然一样，但信仰的坚定程度不一样。信仰很坚定的，无论遇到任何挫折都能坚持下来，比如毛泽东、董必武，还有为信仰牺牲的邓恩铭、何叔衡、陈潭秋以及英年早逝的王尽美。

还有一些人，比如建党不久后退党的李达、李汉俊、周佛海。但这三个人的情况并不一样，李达虽然退党了，但是他的信仰没有变，他仍然为我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又重新入党。李汉俊退党后不久就被反动派杀害，周佛海叛变革命，成了一个大汉奸。

还有建党不久后被清除出党的陈公博。陈公博应该说毫无政治理念，这个人实际是“有才无德的大毒品”。他去参加党的一大的时候，带着他新婚的妻子一起去开会，边开会边度蜜月。晚上开会的地点被敌人发现以后，主要代表们开始分头撤离，留下陈公博负责善后，销毁文件，代表们撤离后不久，法租界的巡防警察就来搜会场，陈公博就有些害怕了，他处理完后续的工作以后，不是去嘉兴和其他代表汇合，继续开会，而是带着新婚妻子去杭州度蜜月去了，也没有向组织说明，以在党的二大之前他就被清除出党。之后，他去美国读书，在美国哥伦比亚读书期间，发表了一篇很重要的文章《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文章的附录部分，把党的一大的党纲和其他重要文件都翻译成英文。陈公博很有才，但后来也成了大汉奸。

还有就是大革命失败后脱党的包惠僧，以及大革命失败后组织“托派”被开除的刘仁静。为什么要强调大革命失败呢？革命一旦遭遇失败，如果信仰不坚定，就很容易发生动摇，这两人就发生了动摇。还有叛逃后被开除出党的张国焘，张国焘也是背叛革命。

2019年3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强调：“一个政党有了远大理想和崇高追求，就会坚强有力，

无坚不摧，无往不胜，就能经受一次次挫折而又一次次奋起；一名干部有了坚定的理想信念，站位就高了，心胸就开阔了，就能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做到‘风雨不动安如山’。”我们的理想信念教育要切实有效管用，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思考：

一要解决理论的彻底性。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无数事实证明，对共产党人来说，只有理论上清醒才能有政治上清醒，只有理论上坚定才能有政治上坚定。”通过理论上的清醒做到思想、信念上的坚定。

二是改善政治生态。如果我们党内的腐败现象还比较严重，跟思想教育所说的道理形成了巨大的反差，那么思想教育也是缺乏说服力的。

三要改善民生。在经过新冠肺炎疫情之后，中华儿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自信进一步增强。我们在抗疫方面彰显了制度上的优势，在疫情缓解以后，表现出了强大的恢复生产的能力，中国是全球的经济体中第一个由负增长转向正增长的，这足以显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强大的生命力、强大的能力。

四要在针对性上下功夫，尤其是对年轻人的教育。截至2019年12月31日，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9191.4万名，其中，40岁及以下党员超过党员总数的三分之一。这是值得我们自豪的，说明我们党有强大的生命力，能够吸引很多年轻人入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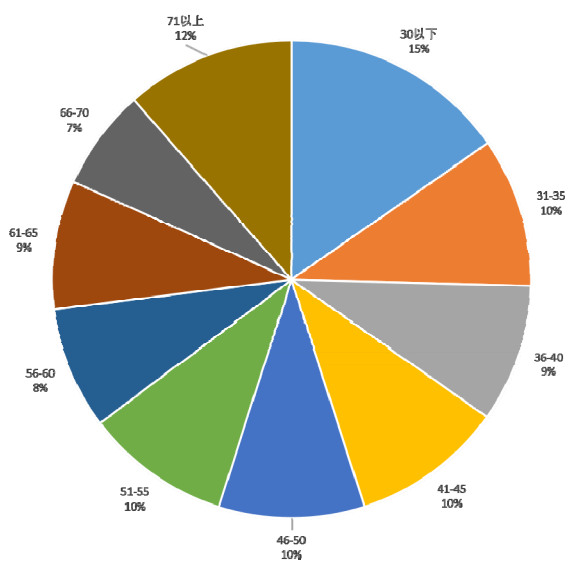


图 1：党员年龄构成表

同时，要看到年轻人的变化。前段时间笔者看到一个教育学家写的一篇文章，说中国的孩子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中国父母教育孩子的方式还是没有太大的变化。这也同样适用于现在的党内教育，党员群体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我们很多时候还是采取一些比较传统的教育方式。网上有很多关于“70后”“80后”“90后”的对比，可以看到，“80后”“90后”更强调自我，集体意识可能要差一些，他们更强调发挥自己的主动性，对传统教育中自上而下的教育不太接受了，会用一种质疑的姿态去看问题。年轻人的想法比较多，自主意识也越来越强，这也意味着我们的党内教育不能再采取传统的教育方式，需要去创新。党建的创新包含着方方面面的创新，其中教育方面也需要创新，无论是教育的内容，还是教育的方式方法上，都需要创新，要用年轻人喜闻乐见的方式，这样我们的教育才能够入脑入心。比如现在很多人力资源培训，都是采取一些互动的方式，我们党内教育，要把年轻人的积极性调动出来，也应该采取互动的方式。

#### （四）从严管理党员

党员是党的肌体的细胞。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是要靠千千万万党员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来体现，党的执政使命要靠千千万万党员卓有成效的工作来完成，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必须从严管理党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只要每个基层党组织和每个共产党员都有强烈的宗旨意识和责任意识，都能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先锋模范作用，我们党就会很有力量，我们国家就会很有力量，我们人民就会很有力量，党的执政基础就能坚如磐石。

对待党员的管理，重在日常管理。

第一，要融入常态化的管理中。党内管理可以借鉴业务管理采用的现代化的管理方式，采用量化管理的方式。有的单位使用积分制的管理方式，从积分项来设置：第一项为基本项，主要是执行党员组织生活制度的情况；第二项为附加项，主要是围绕中心发挥作用的情况；第三项是扣分项，主要是意识弱化，违规违纪的情况。对党员的管理也要优化组织设置，让党员“亮身份、亮职责、亮承诺”，包括党员示范区岗、党员责任区、党员先锋岗、党员承诺制，这些



都是在搭建平台，为党员发挥先锋模范带头作用创造条件。党员亮出身份，亮出职责、亮出承诺，也是对党员的管理手段，因为一旦身份亮出来了，很多眼睛就盯着你，你无形之中也要加强对自己的约束。

第二，要把纪律挺起来。纪律严明是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时候就在党纲中就规定了严格的纪律，党的二大通过的党章作为我们党的第一部正式党章，把“纪律”单独列为一章，更是强调纪律的重要性，同时也规定了违反这些纪律要受到的相应的处罚。党的二大通过的党章规定：言论行动有违背本党宣言章程及大会各执行委员会之议决案；无故连续二次不到会；欠缴党费三个月；无故连续四个星期不为本党服务；经中央执行委员会命令其停止出席留党察看期满而不改悟；泄露党的秘密等，一律予以开除。可以看到，当时党的纪律是十分严格的，正因为有这样严格的纪律要求，也为取得胜利提供了保障。

毛泽东同志讲：“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邓小平同志也讲：“我们这么大的一个国家，怎样才能团结起来、组织起来呢？一靠理想，二靠纪律。组织起来就有力量。没有理想，没有纪律，就会像旧中国那样一盘散沙，那我们的革命怎么能够成功？我们的建设怎么能够成功？”我们这样一个大党，9000多万党员，怎么样能够让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朝着我们的目标一起去努力？一靠理想，二靠纪律，有了理想，有了纪律，我们才能够取得成功。

党的十九大报告第一次把纪律建设与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制度建设并列，共同纳入党的建设中，就像党章所说“坚持把纪律挺在前面，加强组织性纪律性，在党的纪律面前人人平等”；“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执纪必严、违纪必究，抓早抓小、防微杜渐”；“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让‘红红脸、出出汗’成为常态，党纪处分、组织调整成为管党治党的重要手段，严重违纪、严重触犯刑律的党员必须开除党籍”。

把纪律挺起来，就是要抓早抓小、关口前移、重在预防，这是我们全面从严治党的治本之策。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在“管党治党”的过程中发现，党

员违法犯罪无一不是始于破纪，如果我们加强纪律约束，有违纪的问题就去处理、去告诫，可能就会防止出现严重的贪污腐败问题、违法犯罪问题，所以把纪律挺起来，也是对党员领导干部的保护。

为什么把纪律挺起来能够达到这样的效果呢？因为纪律的要求要比法律的要求更高更严，纪在法前，纪严于法。第一，从文本的表述形式上来说，纪律强调的是义务在前，权利在后，党章所规定的党员的八项义务在前，八项权利在后。作为党员，我们首先是要尽义务，然后才是享受权利。而宪法中则是公民的权利在前，义务在后。第二，调整的范围不一样。党规不仅仅调节行为，也调节思想，党规党纪不仅对党员行为有要求、有约束，同时在思想上也有要求，比如我们强调党员要有坚定的理想信念，强调思想上的先进性。第三，标准的境界是不一样的。作为党员，不仅仅是不能够做坏人，所谓的做坏人就是违法犯罪，作为党员，不能只满足于不违法犯罪，而是要做一个好人。今天我们讲好人指的是什么？过去不让大家追求自己的利益，而现在我们追求个人利益合法化，但是作为党员，我们在追求利益的时候，要先公后私。多想群众的利益，少想自己的利益。习近平总书记曾讲过，党员的党性就是“平常时候看得出来、关键时刻站得出来、危急关头豁得出来”，党员要事事表现先进，要发挥先锋模范带头作用，不是仅仅满足于不违法、不犯罪。党员要处处表现先进，在自身利益和群众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要让一让。第四，管的范围不同。党规管得更宽一些、更严一些，我们看六大纪律中的生活纪律部分，它涉及了很多私德，这些东西法律是没有明确规定的，但是党规党纪有着明确的规定和约束。作为党员，必须严守党的纪律，这样党的先进性才能够体现出来。这是我们严格纪律的要求，只有处处表现先进，党员才能够像党员，我们党才能不愧于是一个先进的组织。

严明党的纪律，首要的就是严明党的政治纪律。严明党的政治纪律要从遵守和维护党章入手，遵守党的政治纪律，最核心的就是坚持党的领导，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基本要求，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维护中央权威。

### （五）做好服务

党支部的八项基本任务强调，对党员要教育、管理、监督和服务。服务功能和政治功能是一个硬币的两面，一个是“根”，一个是“魂”。强调政治功能并不等于说不要服务功能，党的宗旨是什么？党的宗旨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强调服务不是只对群众服务，不对党员服务，而是既服务群众也要服务党员。虽然服务群众高于服务党员，但是服务群众的同时也必须服务党员。

党员领导干部对党员既要严管也要厚爱，在党员有困难的时候，组织一定要到位，一定要到场，要送上组织的关怀，送上组织的温暖。比如说“五必访谈”制度：党组织在党员出现严重思想问题时必访谈；党员出现家庭纠纷时必访谈；党员生病住院时必访谈；党员发生事故后必访谈；党员出现特殊困难时必访谈。还有“三上门服务”：党员生病住院、有突发事情时，党组织要上门看望慰问；党员家里有临时困难或有应急事情需要帮助的，党组织要上门服务帮助；党员家庭经济困难，党组织要上门服务慰问，并通过困难补助或元旦、春节期间送温暖等方式给予补助。总之，我们要让我们的党员感受到组织的温暖。

### （六）创新党支部的工作方法

基层的创新，就是要把党员的主体作用给发挥出来。多让党员说，多让党员参与。我们党员队伍中年轻党员的比重较大，年轻党员可能在有些方面给我们的教育、管理带来一些困难，但是也要看到，年轻党员因为他们成长的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们的想法、办法很多，思想很活跃，所以支部工作要发挥党员的积极性、主动性，要把他们的聪明才智给动员起来。创新需要自下而上的党员自主设计，尽可能地让党员成为支部活动的主角，发挥党员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上级党组织在明确主题、要求之后，可以将更多的形式、载体的自主权交给广大党员。把党员的主动性、积极性调动起来，如果支部的活动大家都参与进来去设计，那么在活动的时候，大家的热情就高一些，也更加积极。

在创新方面，支部活动的方方面面都可以去创新。第一，可以创新党员的教育内容和方法，将党性教育与业务能力培训相结合，政治教育和专业教育相

结合。比如有一个支部就设置了“第一议题制度”，把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文章、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作为各级党组织会议的第一议题和重要内容，并以制度的形式固化下来。这增强了我们组织活动的政治性。还有学习方式上的创新，把系统性学习与碎片化学习结合起来，系统性学习占的时间比较长，经常去做的话可能会有一些问题，可以把碎片化的时间利用起来。比如利用B站、抖音短视频等做一些微党课，进行一些微研讨、微交流、微解读、微典型等等，利用新媒体的技术，实现这些想法。

第二，创新党支部的组织活动方式。组织生活需要联系实际接地气，也需要解决问题有干货，让大家每次都学有收获。组织活动要根据单位自己的特色去设计，要随着单位的变化去变化。比如老党员讲传统讲先进事迹，党员讲感悟，就是身边人讲身边事，这样让大家更有共鸣。也可以静态变动态，采用现场观摩、参观红色教育基地、参加公益组织的活动等动态方式进行，让党员有新鲜感，增强组织生活的吸引力。但是这种动态的活动一定是要事前有计划、有方案，在主题明确后要精心设计流程，避免随意性，使组织活动有神圣感、庄重感和仪式感。可以设置一些流程议程，比如重温入党誓词；让组织委员为大家讲党课；交流学习体会；进行小测验；同唱一首歌。这种动态的组织活动一定要先做攻略才有收获。



图3：城建集团在中央党校组织过主题党日——参观校史馆



图 4：城建集团在中央党校组织过主题党日——参观红船



图 5：城建集团在中央党校组织过主题党日——参观旗帜雕塑

图 3、图 4、图 5 是城建集团在中央党校组织过主题党日，参观校史馆、参观红船和旗帜雕塑。每个活动都是精心准备设计的，安排专人介绍和讲解。这样的活动，就比仅让大家走马观花看一下收获要大得多。因此，组织活动一定要提前计划好，做好规划。

第三，创新党建工作的载体。要融入中心抓党建，进入管理起作用，把解决业务工作和管理工作中的难题难点作为党组织活动的重点，把促进业务工作

和管理工作作为重要检验标准。“两张皮”的问题，就是部分领导干部和党员把党建工作和业务工作对立起来，觉得党建工作会影响业务工作。比如说觉得党建工作开会学习，会影响业务工作，怎么样去改变这样的认识？为什么我们强调党建工作的重要性，实际上党建工作不是单纯的党务工作，党建工作主要是做人的工作，要让人们认识到这种意义所在，价值所在。因为人是有价值追求的，对人的行为的规范，一方面靠制度，另一方面要靠价值，制度很重要、很强大。一个人遵守交通规则不闯红灯，这中间制度的力量很大，因为闯红灯会被罚款扣分，甚至会吊销驾照，所以约束他的行为，不闯红灯。同样，价值也很重要，如果一个人形成一个价值判断，觉得闯红灯这个行为不好，是被唾弃的，在任何时候他都不会去闯红灯，这是价值的力量，人是有价值追求的。所以党建工作就是要植入这种价值，植入这种信念，植入这种意义，让大家从平凡的岗位中看到这个岗位的意义所在、价值所在，有了这样的价值追求，就能把人内在的动力给激发出来。这就是党建工作的魅力所在。

为什么我们一直强调要加强党建工作呢？党建工作对我们的业务工作有促进作用，对我们高质量发展有推动作用。如果人有了“能干事”的精神头，有了对自身价值的追求，其热情一定会更加饱满。

根据“学习中国”报告录音整理

责任编辑：兰若 文韬 庞子玥 钟雪

# 智慧城市和信息化推进若干研究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 潘文

**摘要：**不管是智慧城市还是数字化，中国的智能化和信息化水平都在不断提高，文化娱乐也逐渐向网络空间辐射。每个人的生活环境都不一样，要想实现生活方式的变革，除了惠民以外，个人也要发生改变。当前，智能家居的使用越来越广泛，比如通过手机控制操作各种家电。未来，消费不再依赖现金，手机就可以全部解决。另外，北斗导航系统也在做智慧城市和信息化、数字化，助推城市产业转型升级。

**关键词：**智慧城市；信息化；城镇化；智能化；数字化

智慧城市和信息化推进是一个长久的话题，业界很多相关学者，包括科研机构也都提出了不同观点。

## 一、智慧城市的发展

当前，对于智慧城市提得更多的是新型智慧城市的概念，住建部提出了智慧城市试点，在全国刮起了一波浪潮，各地都积极响应智慧城市的建设，在不同的优势范围内，提出了自己智慧城市发展的策略。

### （一）新型智慧城市的建设效益

目前来说，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工业和信息化部牵头的新型智慧城市，是原来智慧城市的一个升华和提质。它的建设效益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由管理城市变为经营城市，这也是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的一个

重点。其实，这也是简政放权的一个必要步骤，以实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协调发展，同时高效率的城市管理带动城市的协调运转。

第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城市。就北京来说，原来是“摊大饼”的发展模式，现在在可调的范围内进行了优化。实际上，对于城市管理来说，在多年的城镇化推进过程中，如果城市无限发展下去，对于资源的消耗量是不可估量的。城市要发展，但不能一味地去追求规模，而要在扩大规模的同时保证质量，这与产业发展一个道理，要求资源得到优化配置，经济产业得到高质量发展。另外，我国人口众多，人民生活质量提升是摆在管理者面前的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同时，人民的物质文化需求也要得到满足，所以不能光盖楼，综合的社会服务能力也要相应提升，保持社会和谐，合理利用自然资源，减少污染和浪费，这是当前城镇化发展的一个主基调。

第三，以人为本提升百姓的城市生活质量。现在，北上广等大城市，成都、重庆、西安等西部城市都在实现城镇化。为此，我们不能只盖居民楼，要有相应的产业承载，同时还要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民众对全面脱贫奔小康，对生活要求也越来越高，这就要求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质量不断提高，赋予市民安全感与幸福感，这也是城镇化体制建设的一个重中之重。

## （二）试点新型智慧城市的主要受益点

试点新型智慧城市的主要受益点在于提高城市知名度。建设智慧城市不是举旗吆喝，树立标杆。实际上，城市知名度是在智慧城市试点上来形成的，比如，结合城镇化的示范，促进产业转型升级，提升经济发展质量，这是一个闭环的周期循环问题。当城市的精细度、管理质量提升了，那么城市的吸引度也就提高了。同时，这也会助推城市产业升级。

## （三）为什么要建新型智慧城市

推进城镇化，通俗地说就是“市民化”。成就一番伟大事业，做重大工程都需要人力推动。城镇化建设、智慧城市也需要人。人口“市民化”，一方面，将显著拉动部分区域房地产、餐饮、品牌消费等基础消费需求；另一方面，也将带来手机消费、休闲娱乐等升级需求。



要让承载这些的基础人口有获得感、归属感，就需要消费升级、产业升级，提高整个人员的层次以及生活质量。研究发现，城镇人口和农村人口在交通通讯、家庭设备、文教娱乐、衣食住行等各方面的人均消费水平差距较大，增量也是不一样的。这里，增量是一个地点因素，在城镇化以后，城市居民的消费量明显增多，而农村居民带来的不仅是消费升级，更是消费观念的转变。另外，要想实现流动人口的“市民化”，就要显著提升相关产业的发展，这也是城镇化拉动内需最重要的一环。

人口“市民化”并不是要把人都吸引到北上广等大城市，而是要有层次城镇化的概念，也就是有中心，还有星点状分布的城市化布局。提高智慧城市的质量，对提升人们的获得感和消费层次是非常有利的。

#### （四）新型智慧城市的本质

如果用堆积木的想法来看智慧城市，一个关键点就是留住人，要从生活、城市管理和产业发展三个方面入手，分不同的模块来进行。比如，要想留住人，就需要让消费升级，让人们在城市里生活有获得感。而且，与生活相应的配套资源，如交通、智慧医疗、教育、就业等都要保证质量。

##### 1.生活管理

2018年9月15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卫健委”）在其官网发布了《国家健康医疗大数据标准、安全和服务管理办法（试行）》（“《管理办法》”）。《管理办法》已于2018年7月12日生效并施行。《管理办法》将对医疗卫生行业数据和网络安全实践产生深远的影响。在教育方面，2012年，时任国务委员刘延东在全国教育信息化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提出：“十二五”期间，要以建设好“三通两平台”为抓手，也就是“宽带网络校校通、优质资源班班通、网络学习空间人人通”，建设教育资源公共服务平台和教育管理公共服务平台。教育信息化是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教育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实现教育现代化、创新教学模式、提高教育质量，迫切需要大力推进教育信息化。实际上，就目前的教育平台建设和下渗的线条来看，做得非常成功。从全球来看，我国在基础教育普及方面，质量也是过硬的。另外，数字化的应用在全球也处于领先地位

位。我们要抓住国家推动的机遇，各个城市要将提高生活品质涉及与居民利益有关的方面，抓实抓紧做出一番事。

再比如养老服务。当下，我国老龄化问题比较严重。有些老人用智能手机很不顺畅，那怎么能通过合适的手段实现智慧养老呢？为此，有的地方做出了很好的尝试，提出虚拟养老的概念，在把整个城市老人的基本情况摸清楚以后，推出线上线下结合的订餐服务，用最简单的办法来方便老人获取数字化进程的发展优势。

从电商平台兴起到现在，人们能切实体会到无现金支付网上购物的便利。实际上，网上打折消费看起来好像是大家购买便宜的物品，实际上这是消费升级。每个人的消费数据都会通过阿里巴巴研究院、百度研究院进行监测，网购商品比在实体店购买的多得多，这就是一种消费升级。

## 2. 城市管理

在城市管理方面，很多地方很早就开始尝试统一创建自己的大数据中心云平台，用智慧城市平台一体化管理的思路去管理城市。比较典型的有阿里巴巴给杭州萧山区做的智慧交通平台，他们通过在云平台分析大数据后，采用绿波导航来协调早晚高峰的交通拥堵问题。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智慧交通点的尝试，在尝试点的发散过程中，政府服务、衣食住行等全部可以在这个平台上进行。

现在，也有很多城市提出线上线下一体的做法。线下有城市服务大厅，线上有城市大脑运行，当然这里还包括一些体制机制以及基本因素，但是这仍是技术进步和各地政府高度重视的结果。比如涉及数据共享，有一些法律权责、数据确权的问题，就要出台相应的法律以后才能解决。总之，我们在不断进步。

## 3. 产业发展

生活管理和产业发展可以用“惠民、强政、兴业”6个字来概括。从产业发展来看，惠民、强政、兴业是环环相扣的，比如，当一个城市的城镇化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就需要产业来支撑了，因为人承载着城市的发展，而只有产业才能吸引人留下来。比如富士康解决了一两万人的就业问题，还有一些软件服务外包企业、硬件厂商企业，都是有利于解决就业的劳动密集型非常好的产业。

人们在解决了就业问题之后，就会希望在这里安家，随之也会消费当地的房地产、城市基建等。这时，消费开始升级。但是，只是消费升级是不够的，要想把人的心留在这里，就必须进行高质量发展，提升人们的生活品质。

产业发展聚焦了各地不同的发展优势，产业发展一般有三个方面，强链、补链、延链。现在产业链招商的主要内容，可以根据一产、二产、三产各自的特殊优势来做。一产是农业，其前端如果数字化、智慧化推进的话，后端的服务、加工包装则需要吸纳更多的人口。若是制造业，在终端的制造环节会加大吸纳更多的就业人口，服务业更是如此。

### （五）新型智慧城市建设情况

智慧城市不可能在每个方面都做得很好，每个城市除了要发展每一个模块，还需要根据自己的特色做出自己的品牌。比如，甘肃兰州的智慧养老就做得很好。现在处于疫情防控常态化阶段，很多地方需要出示绿色健康码，但这对于老人来说并不是很人性化，如果可以用一个简便的方式、功能让老人去接受，效果会更好。又如，新疆克拉玛依聚焦智慧油田；湖北十堰聚焦智慧旅游；辽宁沈阳聚焦智慧产业，对传统产业进行改造升级、数字化转型；江苏无锡做智慧物联，宜兴10年前就开始通过物联网养螃蟹。海鲜产品对于湿度、温度各方面的监测以及养殖过程有严苛的要求，所以通过物联网传感来监测这些数据也是很重要的；东北的黑土地很重要，但实际上黑土地的黑土层在慢慢减少，因为原来对化肥的施药量没有精准的控制，现在通过物联网、通过智慧化管理，对黑土地的再生和施肥量的精准控制都有了很好的解决方案。再如，广东做数字经济、数字政府，成为全国的一个标杆，各委办局的系统全部迁移到省级云平台上，力度极大；重庆是西部的一个工业重镇，特别是电子设备各方面，现在通过智慧化工业互联网促进产业转型发展。

### （六）新型智慧城市建设切入点

总体来看，大部分一二线城市都聚焦于产业发展，因为各地的领导都清醒地认识，如果首先不发展产业的话，城镇化就没有人来承载，同时想要把人留住，就要不断提高他们的生活层次。从市民服务到管理到基础设施，与产业发

展都是相互促进的，这是切入点。

### （七）智慧城市是应对城市转型发展的突破口

其实，这个突破口上有诸多挑战存在。现在以国内大循环为主的话，要内部消化把消费层级提升起来，重振经济。但实际上是有问题的，从投资角度而言，如果投资太密集会有风险，泡沫容易破裂。如果从出口角度而言，现在全球的疫情加上单边主义贸易摩擦的兴起，打击将非常大，所以我们提出国内大循环、国内外循环辅助的说法。面对这个挑战，智慧城市建设就是一个突破口。

2018年以来，我们提出智慧城市要与信息惠民试点相结合，从智慧城市产业集群的发展模式，稳步走向节约、智能、绿色、低碳、新型城镇化建设道路。也就是说，我们不能像原来一样非常粗放地提出智慧城市，仅有一个智慧城市的名片、一个亮点就可以，现在要走可持续的发展道路，不能只为了建设城镇化而建设城镇化，而是要循环地去看待一张图绘到底。

政府的管理水平、产业的体制水平和民生的品质提高水平这三方面是非常重要的，简单来说就是强制性，这也是一个核心目标。

世界银行测算得出，一个百万人口的智慧城市智慧应用程度达到75%，GDP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可以提高3.5倍，这是质量和规模共同促进造成的。如果把这些智慧应用点全部应用到位的话，那么这对于产业后端的益处是很大的。通过数字化应用，消费层级得以提高，产业转型加快完成，城市管理水平也会有隐性和显性的提高，都会促进GDP成倍地增加。那么，什么是隐性和显性呢？原来，我们称之为信息化，现在叫作数字化，实际上信息化投入就是一种隐性投入，所创造的价值是成品价值。比如，一个企业投入数字化转型，投入的钱最后并不能通过获利体现出来，只能从提高效率和降低成本方面来体现。同样，提高效率、降低成本也适用于政府。比如，为什么要建立统一的数据中心、统一的平台，要把各个委办局的系统迁移进来？其实，一方面是为了集约化管理提高效率，另一方面是为了节约成本。

## 二、新型智慧城市的构成基础

新型智慧城市的构成基础可以分成几个层次，权证体系、支撑体系、平台体系，其中最主要的是要有支撑体系。比如，除了原来的通信网络以外，现在还有热点、Wi-Fi等智能基础设施。我们已经迈入了万物互联的时代，实际上有一些一线城市已经达到了这个水平，如智能网联汽车推出的无人驾驶、公交车行驶站点实时查询等。实际上，这是智能基础设施的铺设，不管是井盖路灯还是站台指引，都是由Wi-Fi来支撑的。当我们迈入5G时代，各类基站全部铺开，各类应用层出不穷，包括像微信、支付宝这样的超级应用，也会不断地涌现出来，且关联性非常强。面对这些应用，基础设施智能化提升就显得非常重要。

## 三、新型智慧城市建设的总体目标

现在，对数据共享和云平台大数据中心的建设各地都有了共识，这也是新型智慧城市建设的总体目标。现在，我们处于改革的深水期，很多条框的约束性随着技术的发展也会改进，克服了这些困难，就可以更好地去服务城市发展，服务民众和产业发展。

### （一）新型智慧城市建设成效

新型智慧城市建设成效，简而言之就是六个方面：

第一，管理。改变管理模式，使管理更有效。目前，我们采用线上线下一体的管理模式，线下有城市服务中心、市民服务中心，线上从审批到为民服务，已经从原来简单的流程说明、流程展示提高到实质的办事流程层面。特别是逐步进入疫情防控常态化阶段后，虽然国内疫情基本上控制住了，但国外疫情形势依然不乐观，很多市民需要到市民服务中心办事，为了减少接触，我们开始启动网上办公模式，这是一个典型的倒逼机制。原来，倒逼机制有可能有制度约束，现在迫于疫情形势，倒逼机制开始慢慢发生改变。

第二，服务路径。丰富服务路径，使服务更到位。

第三，社会。维护群众利益，使政治更稳定。老百姓除了要有高品质的生活，市民获得感也需要不断提升。民生需求、产业发展、管理三者是一个循环的过程，才能把城市做得更好。

第四，平安。强化防控措施，使治安更平稳。

第五，民生。保障民生需求，使社会更和谐。

第六，产业。拉动产业发展，使经济更高速。

## （二）智慧城市产业链分析

从智慧城市的产业链来看，从政府开始，把握着整个顶层设计和部门协作间的层层分析。那么，最终用户是谁呢？如果是民众，这个产业就是服务企业，至于内容产业提供商，数字化转型需要专业的机构去做。比如我们的政务——“城市大脑”，原来叫城市运营中心，它需要由硬件、软件解决方案商来承建，如华为、中兴、清华启迪都是做得不错的一些企业，在各个城市都有布局。还有软件企业，像软通动力、浪潮等企业，都是做智慧城市比较不错的企业。在各个行业领域的细分应用解决方案上，各个行业都有细分的翘楚者，要根据自身的企业条件和产业发展实际来做内容服务转型升级。五大运营商也可以做一些创新管理示范，承建地方部分数据中心和政务管理应用的一些工作。

## 四、信息化助力产业转型升级

新型智慧城市的产业链与新型智慧城市的信息化是一脉相承的，现在说智慧城市发展，肯定会提到信息化，这在“十三五”“十四五”当中都有体现。

### （一）县域城市占比情况

以下将对县域城市发展做一个对比。实际上，现在智慧城市提得比较多的就是县域城市。因为在过去10年中，省级城市和地级市基本上把智慧城市的每个点都尝试落实实施了，现在更多关注于树立品牌和怎样提质增效。在我国，县级城市是最多的，做智慧城市产业转型升级也是尤为重要的。县域经济是民营经济的摇篮，是劳务经济的源头，资源经济的支撑，民生经济的灵魂，也是

富裕的标志。

截至2011年，我国县（县级市、县、自治县，不含县级行政区划的市辖区、旗、自治旗）共1948个【注：根据《中国行政区划简册（2014）》，截至2013年，我国县级行政区划数为2853个，其中县级市辖区872个，县级市368个，县1442个，自治县117个，旗49个，自治旗有3个，特区1个，林区1个。】县域行政区域土地面积约为880.6万平方千米，约占全国陆地面积的91.72%；县域人口91311万，占全国总人口的68.1%，县域GDP占国民经济整体比重为51.04%左右。县域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占比超过一半，其发展关系到我国2/3以上人口的福祉、关系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大局。

## （二）县域结构

县域结构是现在城镇化发展的主力，因为一线城市现在都是提质增效约束化发展。县域结构的特点如下：

第一，点多面广，星级结构。

第二，城乡结合，有城有业。根据百强县名单，如果按照胡焕庸线画下来，一般人口密度和产业发展比较有优势的东部，特别是江苏，占据了一大半百强县的前10名。但是从中西部城市来说，则相对较慢。

第三，空间广阔，潜力巨大。对于比较零星的、数量多的县域城市，对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做智慧产业来说，空间则非常巨大。

第四，互补性强，城乡和谐。实际上，互补性强也是参照。中国在最初加入WTO时，内部的东西需要自己消化，制造业产业链条非常完善，民营企业如雨后春笋一般涌出，分工结构合理。每一个县甚至每一个镇，都有一个分工结构。

## （三）经济社会发展

第一，功能转移。在政府尊重企业发展的前提下，也可以做辐射示范，带动中西部城镇化水平、产业发展水平提高。现在，对于一二线城市来说，需要疏解压力，促进部分功能和产业转移。

第二，城乡互补。对于河北来说，北京、天津周围的城乡相对来说不是发

达地区，那么京津冀发展的互补和吸纳就业就有明显优势，产业转移也非常便利，这是一个次区域的概念。

第三，发展升级。

第四，吸引回流。

#### （四）发展需求理解

现在，城市发展需求对地级市来说，不管生活服务、特色产业还是管理方面，都有自己不同的发展诉求，每个城市也有自己不同的发展优劣势，要视自身情况来发展。

#### （五）信息技术引领第三次工业革命

如果从技术视角来看，原来全球各国的工业，参照的是德国、美国工业“1.0”“2.0”“3.0”“4.0”。对我国来说，这些标准都有，但也有一些作坊式的企业。当然，也不只有我国如此。日本、英国也有纯手工作坊、老作坊企业。这种企业也有“4.0”完全自动化的，因为有些企业要在国际上打开市场，必须参照国际标准，达到数字化的标准门槛要求。比如石化领域，如果要在国际运行的话，必须有标准化流程，参照HSE标准。如果达不到标准，就无法走出去，无法在国外落地。当然，现在中国也有自己的标准。比如高铁，倘若按照中国自己的标准输出，在与国外竞争时明显规格要比国外高得多。

几次工业革命到工业“4.0”再到“互联网+”是有一个过程的。也就是数字经济产业转型升级。实际上，对我国而言，“1.0”到“4.0”都有，只是不同的企业有不同的解决方案。如果是乡镇企业转型升级的话，可能就是“1.0”和“2.0”，根据自己的特色优势找转型升级的点，而不是全面铺开。对于国之重器的一些大的制造型企业、生产型企业，则可能要达到国际“4.0”的水平。所以，我们要因地制宜，找到适合自己发展的方式。

#### （六）从信息化到“互联网+”

智慧城市有很多模块，包括助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数字化转型，但在互联网时代并不都是齐头并进的，每个行业、每个领域的难度和互联网数字化的渗透率都不一样。



比如第一产业数字化转型，没有电商平台像消费品领域买件衣服那么简单。第二产业，制造业的流程制造各不相同。比如，陶瓷企业是按照链条，从原料到烧制再到成品；装备制造企业可能还有更复杂的流程；嵌入式软件的开发前面还有锻造工艺的开发和流程。第三产业，如消费品领域来说相对比较简单。比如一些熟知的电商平台，把商品放上去之后，通过第三方平台取得商品收入，消费者通过物流绑定拿到自己的货物，中间平台只是一个担保机构，这样成熟的模式已经有10年时间，得出的结论是，不管数字化转型还是“互联网+”的任何产业，它的梯度从三产到一产的渗透率是依次降低的。

### （七）区域信息化助推产业发展

对于区域信息化这个方面来说，其理解逻辑同样是促进转型升级。

第一，基础设施，包括宽带城市、泛在城市、数据城市。对智能应用基础设施的搭建，以及大数据平台，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核心产业承载体，就是信息产业。信息产业对于很多地方发展是可遇不可求的，它主要有通信、电子、电子信息软件、信息服务、通信、内容安全等方面内容。但是，信息产业，特别是内容服务和软件类的解决方案等产业，有一个发展特点，其具体性非常强，虹吸效应明显，一般聚集在发达地区，这些产业的发展是依靠高质量人才和资本力量的衬托起来的。如北上广深这些大城市的软件信息服务，前期发展是有生存力的，当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产生虹吸效应，会对周围城市的产业发展有较强的吸纳性。当然，如果说发展外包，无论是电子外包还是软件服务外包，都是一个例外。比如说，现在新疆、云南这些边境省市做电子外包服务，再通过“一带一路”战略向外输出，中亚、西亚、东南亚这样输出出去，也不失为一个发展产业的办法，但增值性无法保证。

信息产业还有一个特点——辐射效应，即它的核心带动性、先导性、战略性本身的价值可能价值量有限，但是它带动其他产业发展的能量非常大。其实，各地可以根据自身的特点来发展信息产业，比如信息产业的外包服务，尤其是在胡焕庸线以西发展外包服务，根据自身的特点、气候区域区位特点发展都可以。对于GDP比较发达的信息产业城市，可以发展相应的核心产业，还可以发

展产业基础之上的信息化应用，包括产业的每一个端口，解决方案商的一些产业升级助推应用，这就是一、二、三产的信息化转型。

## 五、“两化”深度融合发展阶段和特点

“两化”深度融合聚焦的是我们普遍关注的，说到产业一般都会想到制造业。第一产业农业的增值性是有限的，第三产业是服务业，比如旅游，即消费型服务业。至于第二产业制造业，是拉动产业发展和产业转型升级的主阵地。

从全国来看，制造业的“两化融合”水平实际上还在硬实力提升的应用时期。可是，对一些发达城市已经是过去时了。所谓软融时期，就是通过信息产业自身发展新产业来助推大的软硬结合的两化融合的发展。“两化”融合的层次如下：

第一层次是制造业的生产架构。信息技术使整个制造业生产制作过程和流程自动化、智能化。

第二层次是管理流程的自动化、智能化。如何管理库存，如何管理整个生产流程，使用什么型号的工具会更有效率等都属于这个范畴。

第三层次是信息化所带来的新文化、新商业智能和新决策的方式。在定义企业或者产业的核心竞争力时，把信息融合到整个决策过程中。我们常说企业有硬实力和软实力。

第四层次是信息化催生新的业态。在电子商务、信息服务业中最为明显。

现在以信息化手段助推智慧城市的发展，助推产业升级，实际上是有一些利好的，包括政策环境的利好、新技术发展的利好。比如，现在处于防疫阶段，之前有人认为人工智能技术不太成熟，没有明显的带动性，也没有便利性和惠民性。如今去任何一个单位，都可以见到以很低的成本价格就能买到的人脸识别系统，而且技术升级非常快。防疫期间，人脸识别在全国普遍上线。起初，进行人脸识别需要摘下口罩才可以，后来通过虹膜就可以识别。又如，语言处理方面，原来科大讯飞的中文语言处理识别率和错误率有些欠佳，现在的中英

文同声传译的错误率非常低，这就是技术迭代进步的体现。

## 六、智慧城市的建设原则

第一，注重实效，惠及民生。着眼于促进经济发展和市民生活改善，大力推进技术、应用、管理以及体制的创新，不断提高城市运行效率和公共服务水平，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第二，发展应用，培育产业。大力培育智慧产业，推动各类新兴智慧产品的研发和智慧型信息技术产品在经济社会各领域应用，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对于大部分的城市来说，发展核心技术有一定的困难。比如人工智能的一些核心技术，只能在北上广深这样的资本、人才的聚集地才有发展的可能性。如果通过建立实验室，引进人才去发展，没有基础肯定是不行，但对应用来说，如人脸识别就完全没必要从应用端口来壮大产业。

第三，创新优化，示范带动。推进技术应用、商业模式、行业应用标准和制度创新；通过示范工程的建设，促进政务、民生、城市管理和产业等领域的智慧应用推广。

第四，政府主导，多元参与。把握智慧城市发展契机，充分发挥政府主导作用；加强开放合作，调动各方积极性；引入多方资源，遵循市场规律，确保各项任务落到实处，实现多方共赢。

原来说智慧城市、城市大脑等，好像政府要投很大成本。其实，改变一下商业运营模式，城市管理就会有更多的商业化手段。比如，城市平台上有一部分可能需要政府出资，数据管理中心可能政府的数据多一点。又如，有一些是可以商业化运营的，像智慧停车、智慧公交，可以嵌入到商业化运营部分，通过官员共同参与的共治方式来解决。另外，县域城市信息化的发展需求，包括它的产业转型升级的一些需求，实际上也是非常多的。从狭义需求来说，就各个产业链条从一产到三产；从广义来说，需要从民众服务到政务服务到便民服务，产业的各个方面都有自己的发展需求。

在信息化助推“两化”融合，信息化助推产业转型升级数字化转型过程中，有一些困境亟待解决：

**第一，制造业散且不强。**品牌打造不力，产业企业的竞争力不强，是困扰很多县级市和城市发展数字化转型的因素，这需要专业的第三方解决方案商，第三方的公共服务平台，来帮助打造品牌效应，帮助企业数字化转型。

**第二，城市产业层级低。**现在，很多城市都把环保、生态提得很高，城市发展就会把这些产业全部抛出去，进行改造升级。这就涉及创新发展的路径选择问题，考验产业的组织化水平和能力。很多地级市、县级市，如果中小企业的产业规模尚可，但在龙头企业的带动下，中小企业上下游问题还需要专业的公共服务商产业服务机构孵化器来进行链条的组织重组和架构，通过招商和平台搭建品牌，实现产业提升。

**第三，产业发展的“五个依赖”。**其一，过多依赖低端产业。现在，一些城镇的中小企业在转型过程中，尝试用微商平台抛出第三方个体因素。但实际上是一个平台的品牌衬托，要让大众接受的话，就要用专业化产业品牌衬托来提升品牌价值。其二，过多依赖资源要素消耗。这是在产业生态红线要求非常高的情况下大家需要注意的问题。其三，过多依赖低成本劳动力。其四，过多依赖传统商业模式。其五，过多依赖低小散企业。

## 七、信息化助推产业转型升级是发展的必然选择

### （一）时代机遇

如今，我们面临着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困境，数字化信息化助推产业转型升级的挑战必须面对，但同时也还是有机遇的，一是技术机遇，即时代发展的技术机遇，我国抓住了互联网时代；二是得益于我国对新兴业态和新兴产业的制度包容性。当然，欧洲也有民俗文化的因素在里面，但对于包容性来说是欠佳的。中国因地制宜，对产业新兴业态的制度包容性还是有的。比如，电子商务从涌现到立法，人大历时5年才通过，这不代表我国政府工作效率慢，相较其

他国家，我国的电子政务比较发达。但关键在于一些新业态是不断衍生变化的，所以立法要根据业态的不断延伸变化而不断修订。同时，如果一个新兴业态没有相应的包容性，那么这个业态可能就发展不起来。

### （二）政策机遇

国家对于智慧城市、数字化转型、信息化的整个发展，一直都是比较重视的。从习近平总书记历次网信工作座谈会的讲话，到各个规划，再到大数据规划等等，对数字化转型、信息化发展都是指明方向的。

### （三）转型机遇

2020年，我国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疫情的考验，现在又受到了全球贸易不确定因素的考验。在此背景下，我国提出了国内大循环为主的国内外双循环策略，在该策略的指引下，给整个国内的城市智慧化转型和数字化发展带来了一些新的需求，这个是可以验证的。原来我们多投资老基建，现在新基建的需求大部分跟数字化、信息化、智慧化相关，这些产业方向无疑是下个10年甚至15年、20年的投资重点，也是一个转型机遇。

## 八、智慧城市建设的总体思路和建设愿景

### （一）总体思路

新型智慧城市建设的总体思路是在不断演进的，智慧城市信息化建设是没有尽头的。如果说哪个城市提出了一个建设目标，那只是在当前时代界限下定的目标，对总体的、很高水平的目标是没有界定的。现在，对于新型智慧城市来说，突出的是一个集中化管理的概念。通过一网感知、全局掌控、一池数据、全时共享、一图可视、全息治理、一体联动、全面协作来完成集中化管理、集中化可控的目标。这里涉及的面包括了从基础到平台建设到各项应用的总体思路。

### （二）建设愿景

结合“十四五”规划及国家部委新型智慧城市的标准，各城市主要围绕基

基础设施、民生、政务、产业四个方面，梳理智慧城市主要内容，打造有自己明确目标、有自己明确定位的智慧城市。智慧城市的建设愿景也是围绕上述四个方面展开的，每个城市都要提出自己的定量和定性目标。

### （三）重点项目建设模式分析

#### 1.公益基础类的项目

属于非营利性项目，主要是支撑智慧城市运行的基础工程与城市管理与提升类项目，相应的运营模式建议采取“政府主导”的运营思路，政府负责基础设施与平台的投资、建设、维护与运营。

#### 2.混合类的项目

属于具有一定盈利性的民生服务类项目，主要是智慧城市运行各类智慧应用，可以考虑企业等有运营能力的第三方共同运营。

#### 3.商业类的项目

属于盈利性项目，主要是智慧产业与经济类项目，企业为运营主体，政府实施监督与管理的原则，通过市场化运作，吸引银行等金融机构、社会资金等多种融资渠道，共同赢利。

#### 4.建议采取运营模式

过去，人们理解智慧城市信息化建设往往认为需要政府出大量的钱，当然这也不可否认。但是，现在商业模式不断演进，有利于商业模式研究，有助于政府做多项选择。

**第一，政府独立投资建设及运营。**有一些政府的独立投资建设，且现在有很多线条实际上已经非常充实了，像公安系统、各地的城管综治工程做得也非常完善，这些都是比较成熟的一些线条。

**第二，政府投资，委托第三方建设及运营。**商业类项目有盈利性的完全可以委托给第三方来运营，像智慧停车系统、智慧路灯系统、公交指引牌系统都可以通过商业模式的变化找到一个很好的盈利模式。

**第三，政府指导（部分投资），运营商、第三方投资建设。**政府投资委托第三方来运营的，像智慧社区建设。智慧社区建设依靠的是整个社区内的不同

情况，可以委托第三方政府投资一部分来共同运作，这是一个不同模式的选择。

#### （四）智慧城市建设运营保障

##### 1.传统模式

充分利用配套与专项资金，对智慧城市建设项目进行科学的规划与建设，并从规划阶段、开发阶段、建设阶段、运营阶段引入专业企业，实行全方位的合作。

##### 2.BOT 模式

政府通过授予企业一定期限的特许专营权，许可其融资建设和经营特定的公用基础设施，企业通过向用户收取费用或出售产品形式回收投资并赚取利润；特许权限届满时，该基础设施无偿移交给政府。

##### 3.BT 模式

企业投资建成后交由政府使用，政府根据协议定期向企业支付使用或租赁维护费用，其中大部分属于公益性项目。

##### 4.BOO 模式

由企业投资并承担工程的设计、建设、运行、维护、培训等工作，硬件设备及软件系统的产权归属企业，而由政府部门负责宏观协调、创建环境、提出需求，政府部门每年只需向企业支付系统使用费即可拥有硬件设备和软件系统的使用权。

##### 5.BTO 模式

项目的公共性很强，不宜让私营企业在运营期间享有所有权，需在项目完工后转让所有权，其后再由项目公司进行维护经营。这是 BOT 演变的一种投资方式，厂商负责建设，交由政府或业主单位负责运营。

其实，信息化助推产业转型升级的总体思路就是要培育经济发展的新优势。在国内大循环策略的引导下，城镇化需要依托自己的优势实现出最后的目标，培育自身经济发展的优势以及自己的智能产业体系，其中比较重要的就是“两化”深度融合的产业体系，传统产业的改造升级和新兴业态的培育壮大也是至关重要的。要依托自己的特色资源和产业经济的禀赋来做，包括自己的区

位、自然资源。比如自然资源，不同地方要根据资源可循环、可持续来发展，像内蒙古呼伦贝尔、大兴安岭和贵州荣江等，可以利用自己的木材资源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对于区位优势，像郑东新区这样地区，可以根据自己纵横结点的位置来发展自己的特色。产品端口方面，重庆可以根据电子制造的优势延伸到后端的软硬件结合发展上来提升产业。可见，各个地方的禀赋不一样，发展特色和品牌也不一样，各地要根据自己不同的优势来发展。

### （五）三个产业的转型升级

#### 1. 农业

第一，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的信息化和数字化相对制造业和服务业来说是比较难的，但现在有很多亮点可以做。比如，农业链条。从农资销售到最后农产品销售有一个完整的链条。比如，信息惠农家 12316 平台；金融工程做了农业信息化的提升工作；农机推广平台，这个现在看来有些过时，但当时这种展示功能对农民很有帮助。

第二，农产品的质量安全追溯问题也是重中之重，原来的质量安全追溯实际上还是比较可行可靠的。但造假者和违法者用的手段也比较多，现在又有不同的新技术商，比如区块链技术的一些应用是不可篡改的。所以，互联网技术发展对农产品的安全追溯是一个很好的辅助补充。

第三，产业链大数据。大北农是一家典型的农业公司，是一个平台性的链条解决方案企业。主营业务是猪饲料，其次是种子、植保产品、动保产品、种猪等。2013 年公司营业收入突破 150 亿元，2009—2013 年营业收入复合年均增长率 43%；员工总人数超过 2.5 万人。近 5 年复合增长率超过 15%；净利润接近 8 亿元，近 5 年净利润复合年均增长率 29%。

第四，农业在物联网上面的应用。黑龙江的黑土地，本来是可以循环往复利用的，但因为化肥施过量了，其厚度开始慢慢降低，盐碱化严重。如果可以精准施肥量，这个问题就可以解决。这就是物联网的再生改造功能，物联网可以运用于农业生产、环境监控、食品追溯等方面。

第五，农业电商平台。其一，云农场，就像网上批发市场一样，主要是“B2B”，



而“B2C”相对比较少。其二，田头批、龙灯电商、农一网、植品汇、点豆等。其三，上市公司们的“互联网+”农业布局。如大北农、新希望、金正大等等。

## 2.制造业、服务业

制造业的数字化转型，用公信系统来理解，实际上就是“两化”深度融合，主要有十大专项行动：

- (1) 全面推进产品与装备智能化开发专项行动；
- (2) 全面推进“机器换人”专项行动；
- (3) 着力推进重点行业与区域绿色安全制造专项行动；
- (4) 深入推进“电商换市”及相关产业发展专项行动；
- (5) 着力推进中小微企业信息化服务专项行动；
- (6) 着力推进骨干企业信息化提升专项行动；
- (7) 务实推进智慧城市建设示范试点专项行动；
- (8) 着力推进云服务产业培育专项行动；
- (9) 重点推进专用电子及软件产业基地建设专项行动；
- (10) 着力推进网络信息产业技术创新专项行动。

各城市根据自己的实际发展信息产业，是做服务外包还是发展核心产业，有几项需要注意：

**第一，电子商务。**深入实施“电商换市”，做强做大电子商务产业规模。加快发展跨境电子商务。探索发展O2O线上线下融合模式，努力开拓各领域电商应用。

**第二，互联网新金融。**支持互联网企业与金融机构合作，鼓励基于互联网的金融产品、技术、平台和服务创新。支持各类互联网金融平台建设，建立并完善社会信用体系。

**第三，智慧物流。**推进交通枢纽和仓储基础设施智能化，推进骨干节点数据中心建设，构建“三位一体”智能物流服务体系，建设智慧物流中心。

**第四，智慧健康。**推动卫生信息平台之间的互联互通和信息共享，深化基于市民电子健康档案的卫生信息化工程，培育支持数字健康产业发展，探索市

民健康服务新模式。

**第五，智慧旅游。**加快建设旅游景区综合管理服务平台和智慧旅游电子商务平台，培育基于在线虚拟体验平台的3D旅游服务业，加强旅游大数据服务应用。

**第六，智慧教育。**推动智慧教育试点建设，创新教学手段和模式，加快智慧校园建设，开发整合各类教育资源，建设大规模智慧学习平台，建设网络服务平台，丰富互联网教育产品。

比如智慧教育。最近笔者到云南调研后发现，虽然教育部的“三通两平台”延伸到各个地方后很有成效，但是各地都有自己的商家在该平台工作，这些工作也有一些亮点如现在比较火的APP“作业帮”，很多学生都在用，就像《今日头条》一样，“作业帮”根据做题点击的频次和错误率推送容易犯错的题目，这相当于学生有了一张自己的个人画像。在这个基础上，有的教育家觉得这种方式不错，根据平常学校的测验将错误频率统计出来，再返回到教师和学生手中，以此加强学生对于自己比较容易失误的地方进行知识巩固。这是原来想都不敢想的，但是现在却变成了现实，这就是智慧教育的一个具体的、小的体现。

## （六）深化“两化”深度融合应用，推动智能制造发展

### 1. 开发智能网络化新产品

围绕传统产品智能化和新的智能产品形态这两条主线，通过在产品中嵌入式传感器、数控装置及软件，丰富产品功能，升级产品性能，创造高价值工业产品。一些县级市的民企企业规模不大，但是设备都是自动化运行设备，不需要太多的操作员，员工都在销售环节，产品销售出去了，增值率以及增值空间就体现出来了。

### 2. 加快发展智能网络化装备

推动传感器和测量仪表、控制系统、单机智能设备及关键部件核心技术和产业化，依托“机器换人”工程，做大做强智能机器人产业。

### 3. 推进制造企业物联网

引导企业建立信息物理系统（CPS），推动生产制造环节网络化，加大“机

器换人”推进力度，实施“机联网”“厂联网”示范工程，加快建立企业间透明供应链体系。

#### 4.推动制造业向服务型制造业转型

加快发展服务型制造业，发展备品备件管理、工控系统安全监控等专业化新业务，实施服务型制造企业试点示范，加快推广先进业态和商业模式。

#### 5.加快重点行业的绿色制造变革

在容易产生污染的行业推广物联网技术，以龙头企业、绿色与安全制造企业为重点，推行资源回收利用技术、低能耗优化作业调度系统等，加快低碳工业园区试点建设。

以上是各地根据自身资源禀赋和发展产业的特点发展信息产业、电子外包、电子核心产业、软件信息服务方面的咨询、设计以及应用服务，都各有不同的特点。

### （七）培育“有活力”的网络服务业

之前，基础网络服务运营商被互联网架空了，成为了管道商。以后随着5G的推行，基础网络服务将成为重点，这是世界发展的一个主基调。因为5G有切片服务的功能，不同场景有不同需求，所以运营商的事情就更多了，这对基础运营服务的定价和服务转型以及运营商也是考验，可以根据各地的实际情况培育网络服务业运营商。

#### 1.推进基础通信服务业转型

培育发展新型通信服务产品和特色业务体系，加快培育下一代互联网、移动互联网、物联网等环境下的新兴服务业态，积极发展基于网络的即时通信、视频娱乐、动漫游戏、视频监控、异地存储、搜索、支付、位置定位等网络增值服务。

#### 2.云计算产业

以云工程及云服务为重点，推进软件和信息服务企业向云服务企业转型，提供云计算专业服务和增值服务，形成完善的云计算公共服务产业体系，推动建设一批政务云、工业云、农业云、电商云、健康云、旅游云等行业专有云，

为行业提供专业云服务。

### 3.大数据产业

以大数据应用为中心，加强数据挖掘分析、商业智能、多媒体加工、可视化软件等自主技术创新，推动大数据产业链协同发展。在政府、工业、商贸、金融等领域，实施一批大数据应用示范项目，以大数据模式构建面向个人、行业、政府的数据服务平台，开发数据资源，实现综合利用，满足用户的多元化需求。

### 4.移动互联网产业

围绕软件、服务平台、应用服务等，引导培育移动互联网产业向特色化、高端化发展，积极推广移动餐饮、移动购物、移动娱乐等应用服务，重点发展移动教育、移动阅读、移动游戏、移动位置服务、移动支付等。

### 5.数字内容产业

加强数字出版产业基地和移动、电信数字阅读基地建设，促进网络文化、视听内容等文化服务业的发展。大力发展数字出版、互动新媒体、移动多媒体等新兴文化产业。支持发展动漫游戏、数字阅读、数字影视、数字音乐、网络艺术品等产业建设具有区域特色的文化创意产业群，打造文化创意中心。

数字产业内容服务的价值率是比较高的。例如动画片《熊出没》，虽然评价褒贬不一，但它却带动了整个动漫产业链条，系列产品、衍生产品非常多。所以，不要小看网络文化和文化品牌。这也是一种区域文化自信，根据自身的特点输出自己的内容产业，再通过数字化转型来提升它的价值。

数字内容产业通过价值层可以衍生出很多产业链条，有红色的数字内容产业，像遵义、瑞金等老革命根据地的文化产业；有粤语文化圈，有闽南文化、闽台文化、粤港澳文化；还有西北文化圈。这些内容的输出至关重要，衍生产品也是非常多的。

### 6.网络安全产业

大力发展网络与信息安全产品与服务产业，推进网络安全、入侵检测、身份验证、可信计算、数据安全等网络和信息安全产品的自主研发与产业化，重

点突破下一代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一定互联网等领域的安全核心技术，建立网络安全产业基地。

### （八）信息化生活开辟生活方式变革的崭新空间

比如好大夫在线平台可以方便民众了解各医院、医生的相关信息，起到了一定的辅助作用。假使今天没有互联网，人们可能不得不通过电话、找朋友等方式去了解相关信息，或者是自己直接跑到医院去打听信息。未来，信息化手段会让民众办事更便捷，医疗、健康、教育领域也会朝着信息化趋势发展。另外，还有凯撒旅游、一嗨租车等，都十分重视信息化路线，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模式。当然，其中也会存在问题。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模式很不错，几年前很多公司都在利用融资提升品牌的价值，等市场趋于稳定以后，在产品价格定制化方面也就慢慢趋于合理了。

总结来看，不管是智慧城市还是数字化，我国的智能化和信息化水平都在不断提高。文化娱乐也会向网络空间辐射。每个人的生活环境都不一样，要想实现生活方式的变革，除了惠民以外，个人也要发生改变。当前，智能家居的使用越来越广泛，比如通过手机可以控制操作各种家电。未来，消费不再依赖现金，手机就可以全部解决。另外，北斗导航系统也在做智慧城市和信息化、数字化，助推城市产业转型升级。

根据“学习中国”报告录音整理

责任编辑：文韬 庞子玥 马程

# 中央红军长征战略方向选择 演变及启示

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 王新生

**摘要：**1934年10月至1936年10月，四路红军队伍先后撤出根据地进行长征，其中第一支是中央红军（后改称红一方面军），第二支是红二十五军（后编入红一方面军），第三支是红四方面军，第四支是红二、红六军团（后同红一方面军第三十二军合编为红二方面军）。尽管这四支队伍都曾在长征途中改变过战略方向，但中央红军改变战略方向的次数最多，高达八次。中央红军长征是在中共中央率领下进行的、里程最远的一次长征，约为两万五千里，其战略方向的改变，不仅直接影响到其他各路红军长征战略方向的改变，更对长征的结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红军；长征；战略方向；战略转移；演变；启示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也称“战略转移”，简而言之，即国民党军对革命根据地进行“围剿”，而红军不能打破敌人“围剿”，需要到另一地方去生存、发展。这个地方可能是现成的根据地，有红军和党组织；也可能是具备建立根据地的条件，红军到后经过努力创建的新根据地。1934年10月至1936年10月两年中，四路红军队伍先后撤出根据地进行长征，其中第一支是中央红军（后改称红一方面军），第二支是红二十五军（后编入红一方面军），第三支是红四方面军，第四支是红二、红六军团（后同红一方面军第三十二军合编为红二方面军）。尽管这四支队伍都曾在长征途中改变过战略方向，但中央红军改变战略方向的次数最多，高达八次。中央红军长征是在中共中央率领下进行的、里程最远的一次长征，约为两万五千里，其战略方向的改变，不仅直接影响到其

他各路红军长征战略方向的改变，更对长征的结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了解中央红军长征中战略方向的改变，有助于进一步加深对红军长征的认识。

## 一、中央红军战略转移的历史理论渊源

在中央红军长征中战略方向选择演变之前，中央苏区第一、第二次反“围剿”时，就曾有人惧怕国民党军队大兵压境，提出要求红军战略转移到其他地方的主张。

1930年10月，结束了与国民党新军阀冯玉祥、阎锡山的中原大战后，蒋介石从走马灯似的新军阀混战中走出来，转而集结力量出手对付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蒋介石调集10万大军，由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主席、第九路军总指挥鲁涤平指挥，向毛泽东、朱德领导的红一方面军活动的中央苏区发动第一次大规模军事“围剿”。与以往一省或数省国民党军对红军的“进剿”与“会剿”不同，这次是蒋介石统一调动全国的反革命军事力量对红军进行“围剿”，大有“黑云压城城欲摧”之势，红一方面军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严峻考验。此时，奉共产国际之命来华接任远东局书记的米夫，对毛泽东、朱德领导的红一方面军能否打破国民党军的“围剿”缺乏信心。米夫在1930年12月2日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致信中提到，一方面认为红军取得反“围剿”胜利“并不是没有希望”，另一方面认为“不排除这样的可能，即在敌人优势兵力的压力下，我们将暂时撤离这个地区。如果要问：是保卫苏区直到最后一个红军战士，还是挽救红军？那么，比较合适的做法，当然是后者。”很显然，米夫倾向于红一方面军撤离根据地，并且他要共产国际考虑：“我们撤退到什么地方为好，在这种情况下，选择什么样的地区作为新的根据地，并继续解决组建红军的问题。”他提出的意见是：“老的地区位于三省交界处，朱德和毛泽东已在那里坚持了两年多，这个地区未必适合……以前朱德和毛泽东率领一支不大的队伍能够在这个山区作战，而现在，当谈到要形成一个有力的红军拳头的时候，该地区以前的优势就会成为完成这项任务的障碍。另一方面，远离发达的群众运

动的地区也是不合适的。”然而，新的根据地究竟选址何处，米夫也没有提出明确的建议。

米夫是提出红一方面军撤离中央苏区进行战略转移的第一人。此后不久，米夫主持召开中共六届四中全会，扶持王明上台，从此开始了对中国共产党和红军长达4年之久的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统治时期。米夫被国民党十万大军大规模“围剿”中央苏区的规模气势所吓倒，表明教条主义者能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对革命的论断倒背如流，把革命理论说得头头是道，但真正遇到困难和严峻的形势就束手无策，无法提出任何实质性的方法建议，现出了空谈家的原形。红一方面军在毛泽东、朱德的指挥下，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1930年12月30日，当孤军深入的张辉瓒师主力由龙冈向五门岭进犯时，预先部署在龙冈地区的红军给予猛击，歼敌近一万人，并活捉张辉瓒。5天之后，毛泽东、朱德又挥师向东，在宁都县东韶歼灭谭道源部第50师三千多人，胜利地打破了国民党军的第一次“围剿”。这是红军自建立以来同国民党军队作战取得的空前的大胜利，在全国引起强烈震动。中共中央政治局1931年2月通过《给中国红军及各级党部训令》高度赞扬此次胜利，认为：“红军一三集团军与江西劳动群众，在苏维埃政权之下的一致行动，得到出人意料外的结果，他们在伟大的中国革命发展史上，已经写上了新的光荣的一页。”

中央苏区第一次反“围剿”胜利，不仅使中共中央感到“出人意料”，而且也使共产国际远东局委员、中共中央军事顾问组负责人盖利斯兴奋异常。1931年2月10日，盖利斯在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军事委员会主席别尔津的信中报告：“朱德、毛泽东、彭德怀几乎收复了自己原有的阵地”“粉碎了对我们的第一次大规模进攻，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蒋介石关于消灭苏维埃运动的种种期限都已成为泡影。”他还神采飞扬地说，“第一次围剿的结果，我们的部队大大增强了……上海的情绪也高涨了。”“第一、三军团大大改善了自己的物质状况。”

1931年2月，蒋介石任命军政部长何应钦为陆海空军总司令南昌行营主任，调集约20万兵力，准备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二次“围剿”。1931年1月15日，



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在江西省宁都县小布成立中共苏区中央局，项英来到中央苏区任代理书记，毛泽东、朱德、曾山为委员。同时，成立以项英为主席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朱德、毛泽东担任副主席，毛泽东兼任政治部主任，原来的中共红一方面军总前委被撤销。由于项英刚从上海过来不久，虽然担任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但其军事知识匮乏，缺乏对敌作战经验，因此，毛泽东仍然在军事指挥上起主要作用。

3月18日，项英主持召开中共苏区中央局第一次扩大会议，此次会议主题是讨论第二次反“围剿”战略方针问题。这次“围剿”，国民党军兵力多达20万，而红一方面军兵力经历第一次“围剿”后略有减少，共有3万余人。从双方兵力对比上看，大约是六比一。在如此悬殊的兵力差距下，红军面临的形势更为严峻。对此，有人对取得反“围剿”胜利缺乏信心，主张红一方面军撤离根据地，另寻出路。这是党内第二次提出红一方面军撤出中央苏区战略转移的主张。毛泽东坚决反对这种主张，认为凭借根据地内的有利条件一定能够打破国民党军的“围剿”。由于两种意见相持不下，讨论没有取得结果，未能就反“围剿”的战略方针作出决定。

4月上旬，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组成的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后的中央代表团到达中央苏区，参加苏区中央局的工作。4月17日，苏区中央局第一次扩大会议在宁都青塘继续举行。这时，国民党大军压境，最迫切的问题还是要确定反“围剿”的战略方针。然而，与会人员就此问题的分歧比上一次开会时更严重。分歧的根源在于中央代表团带来的1931年3月2日起草的关于第二次反“围剿”的补充指示——《中央给一三集团军总前委，第二集团军前委，各军前委，各特区军委，各集团军与各军的军长政治委员的公函》。其中一方面说：“在战略上，当着敌人力量尚未集中的时候，我们必须利用敌人的弱点，击溃敌人的一方。如能诱敌深入，聚而歼灭他，这也是可采用的战略。”另一方面又说：“我们最主要的任务是要在任何情形之下，不要使红军的基本力量受着摧残，必须非常慎重的应付决定胜负的战斗”。“若遇环境不利，不能作殊死战的时候，为着阻止敌人的猛攻，应一面继续战斗，以掩护基本部队的撤退（基本军、

师、团），以便建立新的苏维埃运动根据地。”《指示》认为，在此情形之下，江西红军“可退至湘南、粤桂北及贵州东南。”《指示》与第一次反“围剿”时米夫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信如出一辙，对中央苏区第二次反“围剿”胜利缺乏信心。与米夫给共产国际的信不同的是，《指示》明确提出了红一方面军撤出根据地后所要转移的地区。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的中央在王明的操纵下，完全听命于米夫，这个指示实际上反映了米夫的意见。

项英等不少人认为敌我力量悬殊，敌军的严密包围难以打破，中共中央的指示让项英等人找到依据，主张将红军主力转移到根据地外。担任会议记录员的苏区中央局秘书欧阳钦在回忆中说：“当时有些人受了第三国际布哈林的影响（第三国际挂帅的是斯大林，但做实际工作的是布哈林等人），主张退出中央苏区，到四川去，斯大林讲过四川是最好的根据地。”还有一些人主张“分兵退敌”，采取“削萝卜”战术，即红军分散行动，不在根据地打，碰到一小股敌人就打一下，认为这样做“一则可以使敌人包围落空，一则目标转移，可以退敌。”毛泽东反对这两种主张，继续坚持就地诱敌深入，红军钻到敌人中间去，寻找敌人弱点，打击敌人，依靠根据地军民来打破敌军新的“围剿”，并力主集中兵力，指出分兵不但不能退敌，反而会给红军带来更大的困难。毛泽东的意见被主张“削萝卜”的人讥讽为“钻牛角”，只得到朱德、谭震林等人的支持，处于少数地位。战略方针正确与否决定着中央苏区反“围剿”的胜败和红一方面军的前途，实际上也决定着中国革命的前途，毛泽东提议扩大会议的参加者范围，得到苏区中央局的同意。

会议参加者除中央局成员外，扩大到了各军军长、政治委员，有时军参谋长、政治部主任也参加会议。毛泽东在发言中分析了敌我形势，指出红军打破国民党军这次“围剿”的条件比上一次反“围剿”还要好，胜利的可能性更大。与会许多红军高级指挥员支持毛泽东、朱德的意见，主张坚决在根据地内打破敌人的“围剿”。原来主张分兵的人也同意先打一仗后再视情况分兵。

最终，达成了红一方面军主力留在根据地的共识。在毛泽东、朱德的指挥下，从5月15日至31日，接连打了五个胜仗，自西至东横扫700里，歼敌3

万余人，缴枪2万余支，痛快淋漓地打破了国民党军的第二次“围剿”，并进一步扩大了中央苏区。

试想没有毛泽东坚持正确的作战策略，耐心地说服以及朱德等人的鼎力支持，恐怕红一方面军在1931年4月早已实施战略转移！而那时，红一方面军才3万多人，没有思想上和物质上的准备，广大干部战士还没有对“左”倾教条主义错误有深刻的认识，一旦撤离根据地长途行军至粤桂北或贵州东南或四川，要冲破国民党军的重重封锁，后果是不堪设想的。由此可见，远在中国最大的都市——上海的共产国际远东局、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后的中央，坐在洋房里只知道照搬联共（布）、共产国际的指示，根本无法对革命形势有正确的判断，缺乏对创建根据地开展反“围剿”实际斗争重要性的深刻认识。

中央苏区经过两次反“围剿”胜利后，第三次、第四次反“围剿”时，战略转移的声音不再有了。1932年10月毛泽东在宁都会议上被排挤出红军指挥岗位后，周恩来、朱德又在1933年春指挥取得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这时，“左”倾教条主义者更是不把国民党军放在眼里。在第五次反“围剿”时，认为这是苏维埃和红军同帝国主义、国民党的“阶级决战”，粉碎“围剿”将使我们完全有可能实现中国革命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似乎离全国胜利也不远了，因而提出“御敌于国门之外”的口号。时任中共中央总负责人的博古把红军的指挥大权交给一个不懂中国国情的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李德只会照搬苏联红军正规战经验，分兵把口，打阵地战、消耗战，结果是战局越来越不利。1934年4月中下旬，国民党军集中力量进攻中央苏区北大门广昌。李德集中了中央红军战斗力最强的红一、红三军团，再加上红九军团、红五军团第十三师以及新从龙冈调来的红二十三师，同国民党军决战。4月27日，国民党军队集中10个师的兵力，在飞机、大炮的支援下会攻广昌。红军各部队依托阵地，打退敌军多次进攻，并实施“短促突击”战术，但未能摆脱被动局面。博古、李德被迫放弃坚守广昌的计划，命令红军撤离广昌。4月28日，红军退出广昌。

广昌保卫战是红军历史上最典型的阵地战、消耗战，使红军遭受重大伤亡。在历时18天的战斗中，红军毙伤俘敌2600余人，而自身伤亡高达5000余人，

约占参战人数的五分之一。其中，红三军团伤亡 2700 余人，约占全军团总人数的四分之一。广昌保卫战的失利表明，在李德指挥下，中央红军没有打破国民党军第五次“围剿”的可能，中央红军主力不得不进行战略转移。

最初两次反“围剿”，“左”倾教条主义者对国民党大军压境恐惧，大力主张放弃根据地转移中央红军主力，由于毛泽东、朱德采取了正确的方针，使得红军主力得以留在根据地。第三次、第四次，由于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继续采取正确的方针，依旧取得了反“围剿”的胜利。第五次，“左”教条主义者亲自指挥，既没能打破国民党军的围剿，更是让红军自身陷入险境，只能选择放弃根据地匆匆逃离。

## 二、中央红军主力战略转移的酝酿和 长征中战略方向选择演变的基本过程

中央红军的长征，战略方向转移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

### 第一阶段：酝酿战略转移，到湘西北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师

1934年4月中下旬的广昌保卫战表明，李德的招数不适用于中国国情下的革命形势。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于5月开会，就广昌战役对第五次反“围剿”中的战略战术重新作了评估。毛泽东同志尖锐地批评了博古、李德，称广昌战役是个“灾难”，毫无战绩，指出他们的军事指挥错误在于消极防御、分散兵力、采取堡垒主义的战术，没有胜利把握就轻率作出作战决定。就连支持过“左”倾错误主张的张闻天，也对博古、李德的指挥产生了怀疑。张闻天批评“广昌战斗同敌人死拼，遭受不应有的损失是不对的。”还批评博古过于重用李德，并指出，“中国的事情不能完全依靠李德，我们自己要有点主意。”博古反唇相讥，说张闻天是“普列汉诺夫反对一九〇五年俄国工人武装暴动的机会主义思想。”这是张闻天同博古发生的第一次公开的、激烈的冲突。从此，张闻天同博古的矛盾加深了。会议休息期间，张闻天对伍修权说，李德的打法不可能取得胜利。会后，李德还曾通过博古转告张闻天，“你们都是从莫斯科回来的，

中国的事情还是由莫斯科回来的同志办，你们之间应该消除前嫌，很好地合作。”

李德在回忆中说，他在会上表示：“在敌人坚持堡垒战的条件下，要在苏区内取得决定性胜利是没有希望的；因此，我们必须采取以主力部队突围的方针，以便重新获得广阔的作战区域并为此做好一切必要的准备。同时我们应该在中央苏区以外，例如由第六军团在湖南、由第七军团在福建开辟新的战线，在敌人后方通过威胁敌人与后方的联络来牵制和引开敌人。最后我建议，我们甚至可以丢掉一部分土地，让向前推进的敌人有‘更大的空隙’，使我军能较为灵活地给敌人以突然打击。独立部队和地方部队根据主力撤离的程度，必须在敌人主要战线上牵制和骚扰敌人，也可以采取这个方针。”李德的这段回忆，是在历史尘埃已经落定数十年后写的，其中多少有掩饰自己错误的成分，但有两点是真实的：其一，第五次反“围剿”是没有胜利的希望了，红军主力要进行战略转移。伍修权曾在回忆中说：“一九三四年春，李德就曾同博古说，要准备作一次战略大转移。”可以说，李德是第三次提出红军撤出中央苏区，进行战略转移的始作俑者。其二，派红七军团到福建和派红六军团到湖南中部。

中共中央将会议讨论的结果经远东局报告共产国际。1934年6月2日，远东局书记埃韦特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委员、主席团委员皮亚特尼茨基报告。中共中央当时向共产国际提供了两个方案：一是红军留在中央苏区，坚持打游击；二是将红军主力撤离中央苏区，进行战略转移。埃韦特倾向于第二个方案，并认为转移到湘西北同红二军团取得联系建立新苏区，是比较可行的。

同年6月16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给埃韦特和中共中央回电，虽然同意中共中央、远东局关于国民党军队秋季会对中央苏区发动总攻击的判断，但认为中央苏区还存在打破国民党军“围剿”的希望，要求红军在夏季采取新的举措，放手一搏，扭转局势。这个新举措是派红七军团、红三军团由福建北上，与闽浙赣的红十军一起，在毗邻中央苏区东北部的地区开辟作战区域，迫使国民党军调集部队首先对付他们，从而减轻中央苏区的军事压力。在采取新举措时，从最坏的结果打算，可以做一些战略转移的准备，

如储备粮食等。不过，共产国际的《指示》中，中央红军战略转移的目的地是湘赣苏区，而不是埃韦特提出的到湘西北区。共产国际设想的是，就算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中央红军主力转移到湘赣苏区后，中国的东南部还存在东、中、西三大主力作战集团，仍然具有一定的革命前景。

中共中央没有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做，而是偷工减料，先后在7、8月份派红七军团以抗日先遣队的名义北上和红六军团西征。两支部队出征后，没有起到明显减轻中央苏区压力的效果。到9月份后，中央苏区只剩下一小块地方。从9月上旬开始，博古、李德等开始加紧准备战略转移。博古于1934年9月17日致电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报告：“中共中央和革命军事委员会根据我们的总计划决定从10月初集中主要力量在江西的西南部对广东的力量实施进攻战役。最终目的是向湖南南部和湘桂两省的边境地区撤退。全部准备工作将于10月1日前完成，我们的力量将在这之前转移并部署在计划实施战役的地方。我们期待……这里不晚于9月底作出最后决定。”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于9月30日致电中共中央，表示：“考虑到这样一个情况，即今后只在江西进行防御战是不可能取得对南京军队的决定性胜利的，我们同意你们将主力调往湖南的计划。”

当时，中央苏区共有五个军团，即红一、三、五、八、九军团，共产国际指示战略转移到湖南的主力红军是三个军团。然而，中共中央是将中央红军的五个军团全部进行战略转移，目的地是湘西北，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师。尽管共产国际的指示和中央红军主力战略转移的实施是不一致的，但这是明确同意中央红军主力可以进行战略转移的指示，中共中央名正言顺地拉开了战略转移的帷幕。

## 第二阶段：转兵贵州，以遵义为中心在川黔边建立根据地

从1934年10月25日至12月1日，中央红军连续突破国民党军四道封锁线，在突破第四道封锁线湘江时，遭受惨重损失。博古、李德这时还是按照既定方向，到湘西北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师。但同蒋介石有十年对抗经验的毛泽东忧心如焚，知道蒋介石在湘江之战没有达到消灭红军的图谋之后，肯定不会

善罢甘休。由于中央红军要与红二、红六军团在湘西北会合的目的已经很明显，毛泽东判断，蒋介石一定会在红军前进方向上设置更多封锁线，而且情报表明，蒋介石已经调动了五倍于红军的强大兵力，形成了一个大大口袋，如果再坚持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无疑就是将红军往虎口里送。那么，红军要向哪里进军？毛泽东把目光投向了贵州。

其实，不仅蒋介石与两广军阀在争夺贵州，黔军内部也矛盾重重。黔军四大派系王家烈、侯之担、犹国才、蒋在珍各据一方，你争我夺。同时，黔军军事素质很差，战斗力低下。中央红军若转兵贵州，一方面可以打乱国民党军围歼红军于进军湘西途中的计划，另一方面可以各个击破战斗力弱的黔军，与红四方面军和红二、红六军团形成三足鼎立之势，有利于日后的战略发展。鉴于此，毛泽东提出放弃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改向敌人兵力薄弱的贵州进军的主张。毛泽东的主张得到了张闻天、王稼祥、周恩来、朱德的赞同。

12月12日，中共中央负责人在湖南省通道县恭城书院举行临时紧急会议，与会人员有博古、周恩来、张闻天、朱德、王稼祥和李德等。此次会议，李德在《中国纪事》中称为“飞行会议”，即一次非正式的会议。李德在会议上坚持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他在《中国纪事》中谈到这次会议时说：

“在谈到原来的计划时，我提请大家考虑：是否可以让那些在平行线上追击我们的或向西面战略要地急赶的周部和其他敌军超过我们，我们自己在他们背后转向北方，与二军团建立联系。我们依靠二军团的根据地，再加上贺龙和萧克的部队，就可以在广阔的区域向敌人进攻，并在湘黔川三省交界的三角地带创建一大片苏区。”

李德的主张遭到了毛泽东的严厉批驳。按照李德的话说是毛泽东“粗暴地拒绝了这个建议”。由于事关红军的生死存亡问题，毛泽东严肃地指出，红军主力现时北上湘西，将会陷入敌军重围，后果不堪设想。他根据军委二局破译敌方电台的资料指出，国民党军队正以五六倍于红军的兵力构筑起四道防御碉堡线，张网以待，“请君入瓮”！因此，他建议红军主力放弃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改变战略方向，立即转向西进，到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去。

对于李德到中央苏区以来的“瞎指挥”，党内都颇有微词。毛泽东讲完后，朱德首先表示同意毛泽东的意见。紧接着，周恩来、王稼祥、张闻天等与会多数也表示赞成毛泽东的意见。处于少数地位的博古看清局势后，也就不再固执己见，借故自己患有严重的热带疟疾，早早地离开会场。会议根据大多数人的意见，通过了西进贵州的决定。一向没有军事才能且缺乏主见的博古见李德如此坚持北出湘西、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觉得可以先到贵州，然后再一直向北，这样可能只遭遇小规模敌军抵抗，而达到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目的。为了贯彻博古的这一意图，中革军委于13日21时半急电红一、三、五、九军团及军委纵队首长：“我军已迅速脱离桂敌，西入贵州，寻求机动，以便转入北上”。14日，中革军委又在给贺龙、任弼时、萧克、王震的电报中指出：“我西方军现已西入黔境，在继续西进中寻求机动，以便转入北上。”命令红二、红六军团“以发展湘西北苏区并配合西方军行动之目的，主力仍应继续向沅江上流行动，以便相当调动或钳制黔阳、芷江、洪江的敌人。”

博古和李德之所以坚持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究其原因是对在一个没有基础的地方创建根据地缺乏底气与信心。博古一到中央苏区，就是最高领导人。李德一到中央苏区，就掌握最高军事指挥权。他们既没有创造根据地的艰苦经历，也没有建设根据地的经验，而是坐享其成，发号施令，对根据地的创建者指手画脚、颐指气使，最终把中央苏区弄丢了，使中央红军主力不得不进行战略转移。但他们从不想创建一个新的根据地，而总是想到一个现成的根据地去，以便到了以后继续指手画脚。

12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省黎平县城召开会议，讨论中央红军今后的战略方向问题。这是中央红军长征后，第一次开政治局会议。会议由周恩来主持，出席会议的有博古、毛泽东、张闻天、朱德、王稼祥等。李德因病没有出席会议，托人把他的意见带到会上。毛泽东主张继续向贵州西北进军，在川黔边敌军力量薄弱的地区建立新根据地。王稼祥、张闻天、朱德支持毛泽东的主张。博古则坚持红军去黔东北，然后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这既是他的意见，也代表未出席会议的李德的意见。会上争论激烈，主持会议



的周恩来根据与会多数同志的意见，决定采纳毛泽东的主张。周恩来后来说：

“从老山界到黎平，在黎平争论尤其激烈。这时李德主张折入黔东，这时李德主张折入黔东，这也是非常错误的，是要陷入蒋介石的罗网。毛主席主张到川黔边建立川黔根据地。我决定采取毛主席的意见，循二方面军原路西进渡乌江北上。”李德因争论失败大怒。

黎平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

一、鉴于目前所形成之情况，政治局认为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适宜的。二、根据于甲、使我野战军于今后能取得与四方面军及二、六军团之密切的协同动作。乙、在政治的经济的及居民群众的各种条件上，求得有顺利的环境，便于彻底地粉碎五次‘围剿’及今后苏维埃运动及红军之发展。

政治局认为新的根据地地区应该是川黔边区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地区，在不利的条件下应该转移至遵义西北地区，但政治局认为深入黔西、黔西南及云南地区对我们是不利的。我们必须用全力争取实现自己的战略决定，阻止敌驱迫我至前述地区之西南或更西。这便是史学界所说的“黎平转兵”。

黎平会议放弃去湘西北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计划，决定在川黔边地区建立新根据地，打乱了蒋介石的部署，将十几万国民党军甩在了湘西，从而避免了中共中央、中革军委机关、数万名红军干部、战士覆灭的命运，为此后革命大发展保存了党和红军的精英和骨干力量。在历史的紧要关头，黎平会议改变了中央红军战略进军的方向，迈出了走向长征胜利的关键一步，也为遵义会议的召开迈出了坚实一步。

中央红军进入贵州后势如破竹。1934年末，就在红军士气正旺，准备突破乌江时，李德、博古再生事端，反对北渡乌江。他们主张“完全可以在乌江南岸建立一个临时根据地，再徐图进军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因此，关于中央红军的战略进军方向问题又一次在中共中央领导层内产生争论。

1934年12月31日夜至1935年1月1日凌晨，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瓮安县猴场村召开会议，这是中央红军长征中跨年度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毛泽东在猴场会议上重申红军应在川黔边地区先以遵义地区为中心建立新的根据地的主张。多数与会者赞同此意见，再次否定李德、博古的错误主张，决定红军立刻抢渡乌江、攻占遵义。

猴场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指出：中央红军渡过乌江后，“立刻准备在川黔边广大地区内转入反攻，主要的是和蒋介石的主力部队（如薛岳的第二兵团或其他部队）作战，首先消灭他的一部，来彻底粉碎五次‘围剿’，建立川黔边新苏区根据地。首先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然后向川南发展，是目前最中心的任务。”“必须在‘创造川黔边新苏区根据地’‘彻底粉碎敌人五次围剿’‘消灭蒋介石的主力部队’的基本口号之下，在全体红色指战员中间进行广大的深入地宣传鼓动，最大限度地提高他们的战斗情绪，坚强他们作战的意志与胜利的信心。并且指出新苏区根据地只有在艰苦的、残酷的、胜利的战斗中才能创立起来，反对一切逃跑的倾向与偷安休息的情绪。”“抓住反攻的有利时机，并不失时机地求得在运动战中各个击破敌人，来有把握地取得胜利。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并“号召全党同志为坚决实现这一决定而斗争。”猴场会议最终确定了中央红军的战略方向。从通道会议到猴场会议，中央最高领导层关于中央红军战略方向问题的争论画上了一个句号。

### 第三阶段：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在川西北建立根据地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召开的遵义会议有两个议题，其中一个讨论黔北地区是否适合建立根据地的问题。会上，刘伯承和聂荣臻建议，红军要打过长江去，到川西北去建立根据地。为什么提出这个建议，聂荣臻在回忆中说：

“从到贵州看到的情况，这里人烟稀少，少数民族又多，我们原来在贵州又毫无工作基础，要想在这里建立根据地实在是太困难了。而到四川，一来有四方面军的川陕根据地可以接应我们；二来四川是西南首富，人烟稠密，四川军阀横征暴敛，搞得民不聊生，只要我们能发动群众，站稳脚跟，就可以大有作为；三来四川对外交通不便，当地军阀又长期有排外思想，蒋介石想在四川大量调兵不容易。”会议经过讨论，接受了刘伯承和聂荣臻的建议，“一致决定改变

黎平会议以黔北为中心来创造苏区根据地的决议，一致决定红军渡过长江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苏区根据地。”

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北上，准备北渡长江，然而在土城战斗中受挫，无法渡江，一渡赤水，进至扎西地域。由于无法渡江，遵义会议决定在川西北建立根据地的计划就无法实现。2月8日，在扎西地域的院子街，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决定在云贵川建立根据地。此后，中央红军再渡赤水，回师黔北，重占娄山关、遵义，三渡、四渡赤水，南渡乌江，佯攻贵阳，威逼昆明，虚晃一枪，向滇西北进军。这样，原先放弃的在川西北建立新苏区的机会再次出现。

4月29日，中革军委发出《关于野战军速渡金沙江转入川西建立苏区的指示》：“甲、由于两月来的机动，我野战军已取得西向的有利条件，一般追敌已在我侧后，但敌已集中七十团以上兵力向我追击，在现在地区我已不便进行较大的作战机动，另方面金沙江两岸空虚，中央过去决定野战军转入川西，创立苏维埃根据地的根本条件，现在已有实现的可能了。乙、因此政治局决定我野战军应利用目前有利时机，争取迅速渡过金沙江，转入川西消灭敌人，建立起苏区根据地……”

在经历了遵义会议后三个多月惊心动魄的机动作战后，中共中央的战略方针又重新回到了原点上。

为了使广大干部战士能够了解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之渡江转入川西的战略方针，红军总政治部于4月30日发出《关于渡金沙江转入川西的政治工作训令》（以下简称《训令》），指出中央红军转入川西及川西北活动的政治上、军事上的意义是：

“甲、在政治上，在川西及西北地区创立苏区根据地，是首先就在使中国苏维埃运动及工农红军两大主力——野战军与四方面军更形接近，更能直接地互相配合作战，走向汇合，以实现赤化四川，而为苏维埃在全国的胜利定下确实的基础。这不仅是为彻底粉碎敌人各个击破我们的企图必须的步骤，而且在中国西部强大的苏区之创立，更能团聚、推进全中国的革命斗争。乙、在军事

上，渡江之后，敌人难于调遣兵力，使作战便利争取更大的胜利。两主力之接近地配合作战，能够使我们易于取得胜利，而且胜利亦更大。并且因为地理与政治的各种条件，使敌人无法包围我们，我们能够背靠西部而无后顾之忧。这对于野战军，能够使我们极大地缩短无后方的大规模游击战争，变为有后方依托的运动战。丙、在群众及经济条件上，群众生活之痛苦及革命斗争之紧张的程度，四川不差于云、贵，而经济与物质方面，四川更好些。”《训令》要求各级政治工作人员：“明确地解释中央与军委之决心，并团结全体红色战士，为实现这个决心而斗争”。

#### 第四阶段：继续北上，先提出建立川陕甘根据地，后决定落脚陕甘苏区

1935年6月中旬，红一方面军（中央红军在会师前夕改回以前的称谓）与红四方面军在懋功地区会师。会师后，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朱德等中央领导人发现这里不适合建立根据地。6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两河口召开会议。由于周恩来是遵义会议确定的党内委托对于指挥军事下最后决心的负责人，他首先在会上作了关于目前战略方针的报告。

周恩来在报告中先回顾了红一方面军从中央苏区撤出后进行长征以来的战略方针的几度变化。接着指出：目前两个方面军都离开了原有根据地，要在新的地区创造根据地。在此种情况下，制定战略方针就是要解决“在什么地区创造新苏区”的问题。周恩来列出了适合建立根据地的三个条件：“一、地域宽大，好机动。”松潘、理番、懋功地区虽大，但多是狭路，敌人容易封锁，想在这个地方逼死我们。“二、群众条件，人口较多。”过去两个方面军的根据地人口都比较多，因此能大批扩大红军，松潘、理番、懋功、温[汶]川、抚边这一带，人口只有20万人，而且多数是少数民族，由于民族隔阂还没有完全消除，在少数民族中扩大红军是比较困难的。“三、经济条件。”这一带人烟稀少，粮食缺乏，有些地方甚至还不能自给。草原上的牛羊有限，生活习惯也不容易适应。其他需要的物资，如布、皮等都不容易解决。因此，周恩来的结论是：懋、松、理这块地区的地域虽大，却不利于建立根据地，“我们如陷在懋、松、理，就没有前途。”鉴于这种情况，周恩来明确指出：红军前进的方向应该是

“川陕甘”。为了说明川陕甘的原因，周恩来对周围的形势作了进一步的分析：回头向南是不可能的；东过岷江，敌人在东岸有130多个团，对我不利；向西北，是一片广漠的草原；可走的只有一条路，就是北向甘肃。在那里，“道路多，人口多，山少。在此必定会遇到敌人，我可用运动战消灭敌人。”如果敌人前进得慢，我们可以在这个广阔的地区前进，并向陕西迎击敌人。四川方面现有地区，可以作为游击区，至于到那里后是否还要扩大地区，要到达后再决定。周恩来的报告，得到与会者的赞同。

6月28日，中央政治局两河口会议作出《关于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战略方针》的决定：“在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我们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使中国苏维埃运动放在更巩固、更广大的基础上，以争取中国西北各省以至全中国的胜利。”

张国焘在两河口会议上同意中央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方针，但又惧怕同实力较强的胡宗南部作战，不执行中革军委计划，借口给养困难，反对北上，主张南下，向川康边退却，并提出“统一指挥”和“组织问题”有待解决，故意延宕北上行动。他自恃人多枪多，公然向党中央要权，策动一些人向中央提出改组中革军委和红军总司令部，要求给以“独断决行”大权。中共中央决绝了张国焘的无理要求，但为了团结他，于7月18日任命他为红军总政委。

8月4日至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附近的沙窝召开扩大会议。会议议程一是讨论当时的形势和任务，二是组织问题。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决定增补陈昌浩、周纯全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徐向前为中央委员，何畏、李先念、傅钟为候补中央委员；恢复红一方面军总部，由周恩来任红一方面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由陈昌浩任主任，周纯全任副主任。《决议》重申：“创造川陕甘的苏区根据地，是放在一、四方面军前面的历史任务”。指出“红军基本的严重的责任，就是在川陕甘及广大西北地区创造出这样一个根据地。”“一、四方面军兄弟的团结，是完成创造川陕甘苏区，建

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历史任务的必要条件”。

这个《决议》有以下几点值得注意：

一是开始注意到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侵略的加深对中国社会政治生活的影响。《决议》指出：“帝国主义侵略的更进一步，特别日本帝国主义的占领华北，造成‘华北国’的实际行动。国民经济总崩溃的深刻化，全中国的水旱灾荒，农村经济的崩溃与毁灭。国民党反动统治无法而且不能消灭或暂时削弱造成中国革命的基本原因，相反的，他使这些原因更进一步恶化了。”

二是开始认识到川陕甘地区原有的红军及其影响对建立根据地的作用。《决议》指出：“红廿五军廿六军及廿九军在川陕甘三省的活跃，尤其是一、四方面军两大主力在川西北的会合，造成了中国苏维埃运动在西北开展极大胜利的前途。”

三是把西北地区的特殊社会、地理环境作为创建川陕甘革命根据地的有利条件。《决议》指出：“西北各省是中国反动统治及帝国主义力量最薄弱的地区，在地理上又接近世界无产阶级祖国苏联及蒙古人民共和国，这更造成苏维埃与红军发展的有利条件。”认为“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与适切的战略战术方针，更使我们坚信我们一定能够彻底粉碎敌人对于我们的进攻，创造和巩固西北苏区根据地。”

从这几点看，沙窝会议发展了两河口会议关于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战略构想。尤其是所提到的红二十五军、红二十六军，尽管中共中央还不能确定红二十五军长征具体所到地点，红二十六军及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是否还存在，但已把他们作为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有利因素考虑在内。因此，这个《决议》对于红军长征落脚点的最终锁定又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由于张国焘野心膨胀，不断搞分裂党和红军的活动，并于9月9日电令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政委陈昌浩“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中共中央见说服张国焘北上已经无望，决定率领红一方面主力先行北上。中共中央率领红一方面军主力先行北上是在仓促出发的，在北上红军中，红一、红三军各约6000余人，军委纵队约2000余人，共有1.4万余人，实力比起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的10

万余人相差极大。因此，今后战略方针也需要重新考虑。鉴于此，在到达俄界后的第二天，即9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了扩大会议。

会议首先由毛泽东作关于同张国焘的争论与目前行动方针的报告。毛泽东在报告中说：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是应该在川陕甘创建苏区。但现在只有一方面军主力一、三军北上，所以，当前的基本方针是要经过游击战争，打通国际的联系，整顿休养兵力，扩大红军队伍，首先在与苏联接近的地方创造一个根据地，将来向东发展。因此，关于目前的战略方针，同在川陕甘创造根据地的计划是有变更的，因一、四方面军已经分开，张国焘南下使中国革命受到相当严重的损失。但我们并不是走向低落，而是经过游击战争，大规模地打过去。一省数省首先胜利是不能否认的，现在如此，将来也是如此，不过不是在江西，而是在陕、甘。毛泽东的报告得到与会者的一致赞同，所以原来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计划就调整为在陕甘地区。但毛泽东这里说的在陕甘是在接近苏联的地方，具体为什么地方没有确定。

俄界会议后，中共中央率领中央红军主力继续北上，攻克天险腊子口，翻越岷山，9月18日到达哈达铺。9月19日，林彪和聂荣臻随红二师部队进驻哈达铺。在哈达铺，聂荣臻有一个意外的发现，他回忆说：“在这里我们得到了一张国民党的《山西日报》，其中载有一条阎锡山的部队进攻陕北红军刘志丹部的消息。我说，赶紧派骑兵通信员把这张报纸给毛泽东同志送去，陕北还有一个根据地哩！这真是天大的喜讯！”这时，毛泽东也十分注意收集国民党方面的报纸，以便从中找到有价值的信息。9月18日，毛泽东随陕甘支队第一纵队翻越岷山到达鹿原里后，曾召见侦察连长梁兴初、指导员曹德连，要他们到哈达铺找些“精神食粮”，只要是近期的报纸、杂志都要找来。因此，在到达哈达铺之前，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已经收集到国民党的报纸。李维汉在回忆中说：“在到哈达铺前，在河边的一个圩场上，我看见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刘少奇等同志在一起休息。毛泽东向我打招呼：罗迈，你也来休息一下！我就下马休息，看到他们正在翻阅一张国民党的地方报纸，上面登了蒋介石派大军‘围剿’陕北‘共匪’刘志丹的消息。我们才具体得知有这样大的红军在

陕北苏区积极活动。”9月20日，毛泽东等进入哈达铺。在这里，除了接到聂荣臻派人送来的报纸外，还收集了不少其他报纸。

从张闻天9月22日在《前进报》第三期上发表《发展着的陕甘苏维埃革命运动》一文看，刘志丹等领导的陕甘红军粉碎国民党军对陕甘苏区第二次“围剿”和红二十五军粉碎国民党军对鄂豫陕苏区第二次“围剿”。这说明：一是红二十五军、红二十六军不但存在着，而且在不断发展壮大，令国民党当局十分头痛，烦闷不安。二是陕甘边界地区存在大块根据地，情况甚至同1931年中央苏区的情况差不多。

张闻天还依据所知道的“徐海东同志所领导的廿五军以前曾占领甘南之两当、徽县，逼近天水，陷秦安，渡渭水，而至陕甘之交，取得许多伟大胜利”的情况，推断红二十五军“现在想来已与陕北之廿六军取得了联系。”这是十分准确的推断，这时离红二十五军与红二十六军在永坪会师也就五天。

从沙窝会议以来，中共中央一直把红二十五军、红二十六军作为北上建立新根据地的有利因素，甚至在张国焘即将分裂党和红军时，中共中央还以陕甘有红二十五军、红二十六军配合，可以开展新局面去劝告他。那时，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还不知道两支红军的具体情况，他们对红二十六军情况的了解来自于随军参加长征并任红军总政治部破坏部（即白军工作部）部长，中共陕西省委原委员、秘书长贾拓夫。1933年夏，陕西省委机关由于叛徒杜衡的出卖而被敌人破坏后，贾拓夫曾与省委其他负责人一起撰写《陕西省委给中央的工作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报告》中第四部分“红二十六与二十九军”和第五部分“抗日义勇军”是由贾拓夫撰写。他所了解的红二十六军的情况，只是红二团南下渭华的以及渭北游击队改编为红二十六军第四团曾取得过一次袭击敌人胜利的情况。现在，原先知之不清的红二十六军不但依然存在，而且要情况要好于预期很多，且判断红二十五军可能已与红二十六军取得联系。这说明，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后，中共中央制定北上战略方针是完全正确的！北上才有出路、才有落脚点、才能大发展！

9月22日，在哈达铺关帝庙，毛泽东召集红一、三军和中革军委纵队团以



上干部开会。毛泽东同志在会上作了政治报告：“我们要北上，张国焘要南下，张国焘说我们是机会主义，究竟哪个是机会主义？目前，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我们就是要北上抗日。首先要到陕北去，那里有刘志丹的红军，我们的路线是正确的。”

9月27日，红军陕甘支队到榜罗镇的当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常委会议，决定率领陕甘支队迅速北上，同陕甘红军和红二十五军会合，在陕北保卫和扩大苏区。第二天清晨五点，陕甘支队召开干部大会，传达会议精神。会上，毛泽东、彭德怀、张闻天、林彪都作了讲话。毛泽东在报告中说：“我们经过了藏人区域，在那里是青稞麦子，雪山，草地，我们受了自有红军以来从未有的苦。”“我们突破了天险的腊子口。我们重新进入了汉人区域，我们渡过了渭河——姜太公钓鱼的地方。”“现在，同志们，我们要到陕、甘革命根据地去。我们要到抗日的前线上去！任何反革命不能阻止红军去抗日！”“我们出了潘州城以来，已经过了两个关口——腊子口和渭河，现在还有一个关口，就是在固原、平凉的一条封锁线。这将是我们的长征的最后一个关口”。“同志们！努力吧！为民族，为着使中国人不做亡国奴，奋力向前！红军无坚不摧的力量已经表示给全中国、全世界的人们看了！让我们再表示一次吧！”

10月19日，中央红军主力胜利到达陕甘苏区的吴起镇，完成了两万五千里长征。以上就是中央红军长征中战略方向的演变的基本过程。

### 三、中央红军长征战略方向选择演变的启示

第一，体现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中央红军长征中的战略方向选择，是在同“左”倾教条主义和张国焘的右倾分裂主义斗争中作出的，是从敌我情况、群众情况、地理条件等实际情况出发。虽然不可能一直完全正确，但在当时的情形下，使红军摆脱了国民党军重兵的围追堵截，避免了遭受惨重损失，甚至是全军覆灭的命运。由于思想方法正确，一步一步朝着保全自己的方向走，最终找到了最佳落脚点，胜利实现了战略转移的目标，完成了长征。

第二，体现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央领导同志杰出的才能和智慧。敌人是很狡猾的，中央红军每改变一次战略方向，实现某一战略目标，都要通过自己的行动，调动国民党军队，牵着他们的鼻子走，使其犯错误，出问题。然后红军利用他们的错误，或消灭他们一部分，或使他们封锁线、包围圈出现缺口，从中突破，顺利实现自己的目标。从西入贵州、突破乌江、四渡赤水，到南渡乌江、兵临贵阳、威逼昆明、巧渡金沙江，再到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夹金山，这些军事行动可谓精彩绝伦，在战争史上堪称经典。

第三，体现了党中央深远的战略眼光。中央红军战略转移所要选择的目的地，不但要能够生存，更重要的在于发展，而且需要具备较大的发展潜力，使其能够快速发展，从而对全国政治产生重大影响。中央红军长征落脚点最终确定为陕甘苏区（习惯上称陕北）。这里不仅有原有的红军和党组织，群众基础好，而且地理位置好，往东能够速出华北，一旦形势发生变化，红军能够直接到抗日前线，迎来大发展的机遇；往北靠近外蒙古和苏联，一旦形势不利，可以往北发展，得到国际帮助，可谓进退有据。后来的事实完全证明了这一点。

第四，党的团结是长征胜利的保障。比如，博古犯了“左”倾错误，遵义会议上对他进行了批评，但对他采取了团结的方式，依然使其担任中央总负责人。到了“鸡鸣三省”会议，张闻天接替他担任总负责人，博古仍然是中央常委。渡过金沙江后，博古开始赞同中央红军的战略方向。在同张国焘的斗争中，中央领导依然采取了团结的方式，张闻天、博古在同张国焘的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由此，我们可以得到启迪，不论是国家、某一省、某一市、某一县、某一部门、某一单位、某一企业、某一个人，正确选择目标、选择发展方向是非常重要的。

根据“学习中国”报告录音整理

责任编辑：文韬 肖丽芬 马程

# 新时代创造新模式 新模式学习新思想

## 学习中国智慧党建运管中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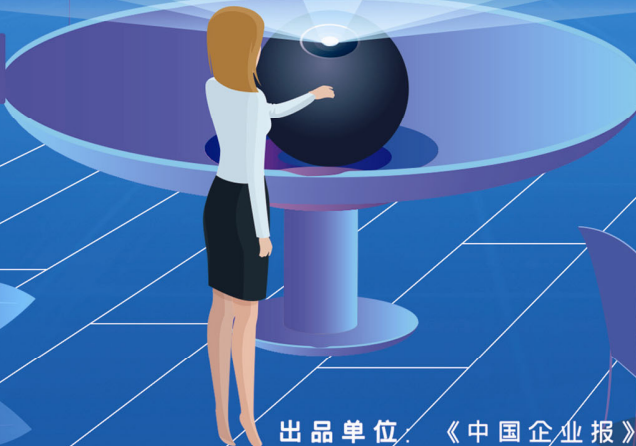
智慧党建运中心（智慧党员活动室）是在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知识组织、智能云平台基础上，再运用AI、VR和多媒体技术打造的多网跨终端共享的全场景智慧化党建多功能中心，是党员个人活动和组织活动的智慧空间。它把一个传统的物理空间变成一个大的智能终端，为新时代的党建工作插上信息化和智能化的翅膀，开启智慧党建新模式，开创全场景智慧党建新时代。

### 创建中心的目的

- 为智慧党建引领示范
- 构建全场景智慧化党建新模式
- 解决个人学习与集体学习“两张皮”问题
- 解决内容和技术“两张皮”问题
- 解决线上线下“两张皮”问题
- 解决单位内部的多平台和信息孤岛问题
- 解决多网融合问题
- 解决多终端融合共享问题

### 建设中心的重要意义

- ◆ 中心是党建智慧化重要标志
- ◆ 中心是提升基层组织执政能力的智能空间
- ◆ 解决个人学习与集体学习“两张皮”问题
- ◆ 中心是提升党员综合素质的智能教室
- ◆ 解决线上线下“两张皮”问题
- ◆ 解决单位内部的多平台和信息孤岛问题
- ◆ 解决多网融合问题
- ◆ 解决多终端融合共享问题



出品单位：《中国企业报》集团智慧党建研究院

联系方式：010-62805956、68001238

联系人：薛红霞15010167295 王强18518039399 刘红13126508885



# 文明十二家

# 盛开幸福花

WENMINGSHIERJIA SHENGGKAI XINGFUHUA

文明十二家是家风建设的好形式  
文明十二家是和睦家庭的芬芳园  
文明十二家是幸福家庭的欢乐谷  
文明十二家是文明家庭的小舞台  
文明十二家是文明乡风建设的专业户  
文明十二家是良好家风传承的推进器  
文明十二家是淳朴民风形成的加油站



学习中国微信公号 “学习中国”APP 世界家风微信公号

刊号 | CN 42-1837/C  
ISSN 2095-5103

邮发代号 38-406

国内定价15.00元